

内部学习资料
仅供参考 严禁外传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生活经济学

北大承泽 **参考**

2026年2月

制作单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制作部门：北大国发院传播中心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Peking University



《北大承泽参考》获取方式：

扫描“北大国发院学习小助手”二维码加入学习群，我们将在群内第一时间分享新刊电子版。



北大国发院
学习小助手

目录

生活经济学

热点分析

01

- 卢锋：公共资源配置视角下的供强需弱矛盾解析与应对.....4
- 王一鸣：金融如何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22
- 施康：大国竞争与“十五五”人民币汇率展望.....46
- 何晓贝：促进物价合理回升有必要成为货币政策的硬指标.....62

报告精要

79

- 北大国发院 2026 生活经济报告81

管理课堂

93

杨壮：勇气领导力——重塑 AI 时代的企业家精神 95

侯宏：AI 时代企业家心力的三重修炼 121

承泽精选

137

黄益平：“华盛顿共识”破产后，全球南方的发展路
在何方？中国经验给出答案 139

刘国恩：迈向星球治理的“数字罗盘” 170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10th
Anniversary
1994-2024

01.

热点分析

编者按：

中国经济步入转型深化的关键阶段，“供强需弱”的结构性矛盾凸显，新质生产力培育成为发展核心，诸多热点问题交织构成经济发展的复杂图景和紧迫需求。这就更需要在大国竞争背景下做好宏观调控，包括在金融改革方面把握好方向并取得突破。

本期的热点分析栏目精选四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为破解发展难题、把握发展方向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思路。

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卢锋从公共资



源配置视角解析“供强需弱”矛盾的成因与结构性特征，提出通过调整公共资源配置结构以补齐消费短板的核心对策。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聚焦金融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阐释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转型方向，呼吁推动“科技 - 产业 - 金融”良性循环。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教授施康立足大国竞争格局，研判“十五五”期间人民币汇率的升值逻辑，提出推进金融货币领域改革与实施积极宏观政策的建议。

北大国发院副研究员何晓贝分析当前货币政策的实施困境，主张将促进物价合理回升确立为货币政策首要目标，并给出了具体调控策略。

四篇文章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判断：当前经济结构的深层调整，已不能仅仅依赖传统政策工具的边际修复，而需要从资源



配置、金融体制、货币框架等基础层面寻求系统性突破。这不仅关乎短期增长目标的实现，更决定中国能否在新的国际竞争格局中确立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卢锋：公共资源配置视角下的供强需弱矛盾解析与应对

王一鸣：金融如何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施康：大国竞争与“十五五”人民币汇率展望

何晓贝：促进物价合理回升有必要成为货币政策的硬指标



卢锋¹：公共资源配置视角下的“供强需弱”矛盾解析与应对

近两年，我在院内和其它交流场合讨论“供强需弱”现象时提到一个观点，就是需要从公共资源配置视角深入分析其成因，因而有必要对公共部门资源总量规模与使用结构加以估测。经过最近大半年与年轻同事的共同研究，目前已形成部分阶段性成果，借此机会作简要汇报。

当前，“供强需弱”问题的讨论面临新的政策背景。2025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充分肯定经济增长成就，明确指

1. 卢锋：北大国发院校友学院发展基金讲席教授。

出“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同时强调这是“发展中、转型中的问题，经过努力是可以解决的”。

高层对这一矛盾的精准论断，引发了我们对三个问题的思考：为什么高层提出“‘供强需弱’矛盾”这一新论断？如何理解“供强需弱”是“发展中、转型中的问题”？如何推动这个“发展中、转型中的问题”得到逐步化解？我将围绕这三个问题，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供强需弱”的表现与成因

“供强需弱”的“供强”表现：“供强”有充分的现实依据，是我国数十年发展积累的重要成果。2023年底，我在一次专题分享中曾提出，“供强”主要体现在：基建持续领先、传统工业优势增强、前沿行业频频突破、技术产业显著提升，以及贸易竞争力的持续提升。“新三样”、“新

新三样”，众多企业在AI创新领域奋发有为。生产力供给侧阶段性新突破，体现我国长期发展形成的深厚技术积淀与赶超潜力。当然我国科技产业在不少领域与国际先进水平仍有不同程度距离，未来需要持续努力追赶。

“供强需弱”的“需弱”表现：从逻辑上而言，“供强”并不必然导致“需弱”。结合我国公共资源配置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供强”在很大程度上是公共部门投入大量资源推动形成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内生了“需弱”的特征。我国“需弱”的核心表现是需求增长动力不足，这一趋势自2018年起逐渐显现。2019年前后与2022年的两次物价波动，均由特殊外部冲击引发，并非宏观经济基本面周期性作用的结果。2019年的物价上涨与非洲猪瘟引发的猪肉价格波动相关，2021年的价格变化则源于疫情对供求两端的冲击，且同期

出口的强劲表现进一步放大了价格波动效应。一般物价阶段性处于低位，反映供需关系的现实矛盾——若仅通过行政手段人为抬升价格，而不调整深层结构，反而可能加剧问题。

“需弱”呈现出鲜明的结构性特征，可被拆解为五重层层递进的矛盾关系。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总需求又分为外需和内需，其中内需偏弱是总需求不足的主要矛盾；内需结构又可以分为投资与消费。尽管当前投资领域也面临紧迫挑战，但从长期视角来看，消费不足仍是主要矛盾。甚至可以说，投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消费不足引发的市场内卷和反内卷，进而抑制了投资动力。进一步拆解，消费又可以分为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居民消费不足是主要矛盾；最后，在居民消费中，又可以分为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服务消费不足是其中的主要矛盾。

上述结构性特征相对稳定，显示多方面矛盾关系中，居民消费相对不足影响比较关键。

“供强需弱”的成因：学界对“供强需弱”成因已有诸多探讨，包括收入分配失衡、社保体系不完善、户籍制度约束等体制性因素。值得深思的是，这些问题存在已久，为何迟迟未能得到根本性解决？我认为，一个较少关注原因在于公共资源配置的传统架构，这一架构已潜移默化地成为各方普遍默认的前提。解决消费不足、实现收入倍增等目标，终将面临“资金来源”的现实困境。

事实上，我国公共部门掌握着规模庞大的资源，这些资源通过常态化机制主要投向投资与生产供给端，虽然新时期决策层对民生领域重视程度增加，公共资源用于民生消费支持规模趋势性扩大，然而现实观察尚未达到与供给资源投入与增长速

度相匹配程度。这一点构成“供强需弱”矛盾的深层体制成因之一。

公共资源规模与配置估测

不同于“三驾马车”“扩内需”的概念前提，我们对公共资源配置进行定量考察时选择的研究思路是“投资-供给”与“民生-消费”的二分法。投资在短期内虽可形成需求，但一旦项目建成便转化为供给；若消费长期不足，单纯扩大投资虽能短期缓解供需矛盾，长期仍会加剧失衡压力。这一分析视角并非否定短期扩大投资的必要性——若投资大幅下滑，短期刺激政策仍不可或缺——而是从长期发展维度，揭示公共资源配置对经济结构的深层影响，与短期政策导向并不冲突，而是相互兼容。

我做了四个层次的估测：公共部门概念与我国特点；2023年公共资源总量估测；公共资源支持供给侧规模；公共资源支持

消费端规模。

1、公共部门的概念与我国特点

公共部门是公共经济学中的基础概念。按照国际机构的界定，公共部门 = 广义政府 + 公共企业或国企。其中广义政府包括“唯一威权主体”意义上的狭义政府加上社保基金，再加一些非营利机构（NPIs）。

我国公共部门具有极为特殊的结构特征，这一特征深刻折射了我国的体制优势、历史演化背景与发展模式特点。在国际比较意义上，我国公共部门至少有两个突出的国情特点：第一是党的领导原则。中国共产党并非公共部门的组成部分，而是公共部门的全面领导者，这是由“党领导一切”的根本原则所决定的。第二，我国公共部门自身具有三大特征：包含对象广、职能覆盖宽、体量规模大。

一般认为，我国公共部门由三大部分

组成：政府 + 国企 + 事业单位。尽管有观点认为应将群众团体纳入其中，因其接受党的领导与政府管理，符合公共部门的核心定义，尤其是进入政协的 18 个人民团体。但鉴于这些群众团体掌握的额外资源有限，本研究暂不将其纳入分析范畴。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国事业单位的性质与西方语境中的 public institution 存在本质区别：我国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与高管由政府任命，运营费用主要依赖政府支持，甚至存在行政部级规格的重要事业单位，这些特征均无法通过 public institution 的常规定义来概括，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2、2023 年公共资源总量估测

依据政府、国企、事业单位这三大部分来理解，我国公共部门掌控的资源主要由四个方面构成：一是广义财政“四本预

算账户”的收入或资源；二是国有企业净利润扣除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后的剩余；三是部分事业单位（如公立医院、高校等二类公益机构）通过市场提供服务所获得的收入；四是公共部门固定资产通过折旧计提所耗费的资源。

综合上述四个方面，本研究以 2023 年为样本年份进行估算，结果显示：公共部门资源总规模约为 60.5 万亿元，约占当年 GDP 的 48%，较广义财政规模高出三分之一。需要强调的是，这一 GDP 占比并不是 GDP 构成意义上的比例，而是以 GDP 为尺度衡量公共资源相对规模的比例。

3、公共资源支持供给侧规模

公共资源用于投资与供给端支出，主要包括五项：折旧支出、国企与事业单位额外收入中用于投资与供给的部分、政府

性基金支出、一般公共预算中明确投向供给端的支出、产业基金等其他公共部门相关支出。

经估算，2023年公共部门投向供给端的资源规模约为33.21万亿元，占GDP的26.35%。经一致性平减调整后，这一比例为25.5%。

4、公共资源支持消费端规模

公共资源用于民生消费端的支出，主要包括六项：社保基金支出、政府实际消费、社会实物转移、事业单位市场收入消费部分扣除、政府消费含折旧费用，及“社会实物转移（social transfer in kind: STIK）”含财政对医保补贴。

经估测，2023年公共部门投向民生消费端的资源规模约为29.29万亿元，占GDP的23.24%。经平减调整后，这一比例为22.5%。

需要提到的是，总消费在统计上包括家庭消费与政府消费，其中 STIK 虽计入政府消费，但实际由居民使用，需在分析中予以区分。

综上，我国公共部门掌握的巨大资源中，超过一半投向了投资与供给端，接近略小的一半投向消费端。这一配置结构是我国的重要特征，已内嵌于数十年形成的体制机制中，成为各方讨论宏观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默认前提。鉴于其涉及的资源规模占 GDP 的 48% 左右，理解这一配置结构是破解经济结构性矛盾的关键。

公共资源配置的影响探讨

1、公共资源配置结构解释了我 国宏观经济结构特点

我国宏观经济结构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由公共资源配置结构决定。公共资源

配置结构解释了我国高投资率的结构特点。我国投资率较 G20 国家平均值高出 16 个百分点。这主要源于两方面：一是私营部门投资率的影响，据储蓄率相关数据推算，这一影响约为 2 个百分点；二是公共部门投资的显著贡献。我国公共部门投资（含折旧相关投资）占 GDP 的比重约为 20%；而美欧国家政府投资占 GDP 比重仅为 4% 左右，加上少量国有企业投资，总占比约 5%。两者相差约 15 个百分点，叠加私营部门的小幅差异，恰好解释了我国与 G20 国家投资率的 16 个百分点差距。

公共资源配置结构解释了我国低消费率的结构特点。我国居民消费率较 G20 国家平均值低 18 个百分点以上，这一差异同样可通过公共资源配置结构解释：一方面，美欧国家公共部门资源占 GDP 比重在 40% 上下，除大约 5 个百分点用于各种投资，投入到消费方面的资源应占 GDP

的 30% 以上，而我国仅为 22%，相差近 10 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我国社保与民生支持体系虽取得巨大成就，但仍不够完善，尤其对较低收入城乡居民的支持力度相对不足，导致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强。居民储蓄率较 G20 其他成员均值高出近 20 个百分点。结合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 GDP 约 40% 的比例推算，较高储蓄率解释了约 8 个百分点的消费率差异。以上两方面因素叠加，基本能够解释我国与国际水平的消费率差距。

这一分析表明，我国宏观经济结构的特征并非单纯由市场自发形成，而是公共部门为实现长期赶超目标，在资源配置中侧重投资、供给与科技领域的结果。尽管我国同样重视民生与消费，但配置比例的不平衡，最终形成了当前的结构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发展过程中主动选择的结果。

2、与“供强需弱”的内在关联

前文所述的公共资源配置结构仅是“供强需弱”形成的必要条件，这一矛盾的凸显还因另外两个条件：

一是市场体制完善与民营企业成长等结构条件。以华为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其研发投入规模已与中科院不相上下；“新三样”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也主要由民营企业引领。市场体制的活力与民营企业的竞争力，与公共资源的供给端投入形成叠加效应，铸就了我国的“供强”优势。但与此同时，民营企业的强劲供给能力与公共资源的持续加持，在消费端投入不足背景下，会进一步增加了供需不平衡压力，使“需弱”问题更为突出。

发展阶段与时间积累的演化条件。供给能力的发展并非线性过程，而是呈现阶段性特征。近期中央文件所提及的“阶梯

式递进”，是对这一发展规律的准确概括。经过数十年积累，尤其是十八大以来的调整与突破，我国供给能力实现了新一轮阶段性跃迁，“供强”特征日益凸显；而消费不足问题虽长期存在，但在特定发展阶段通过三类调节方式得以缓解：一是扩投资（短期转化为需求）；二是增出口（通过外需弥补消费不足）；三是去产能（借助超市场手段对供给能力做减法）。然而当前，这三类调节方式的空间已显著收窄：投资回报率持续下降，扩大投资的难度与风险增加；我国货物贸易顺差已突破万亿美元，制造业顺差占全球较大比例，进一步拓展外需的空间有限；行政化去产能则面临多重约束，难以持续推进。在此背景下，“供强需弱”的矛盾逐渐凸显，成为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着极为特殊的局面：一方面，我国在诸多科技产业取得突破性

进展，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体现新中国几代人不懈奋斗的成果；另一方面，“需弱”引发的抑制型增长态势近年持续存在，不仅会影响长期供给能力，还可能引发社会矛盾催生一些超出经济领域的复杂因素，亟待高度重视。

但是，这一局面也蕴含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若能有序调整公共资源配置，将部分资源转向民生与消费端，不仅不会阻碍供给端的赶超进程，反而能通过扩大产能利用率、提升企业利润，为投资增长与前沿产业追赶提供更坚实的支撑。此前看似此消彼长的“供给”与“消费”，可形成相互促进关系：消费短板的补齐，将为供给端的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政策含义

基于上述分析，政策核心导向清晰明确：不仅要扩大消费规模，更要着力提高

消费率。唯有提高消费率，才能实现宏观经济结构调整与再平衡。这意味着需要使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增长速度需超过 GDP 增速。

单纯依靠政府新增发债并非治本之策，从过往经验来看，新增发债资金大多仍流向供给端。根本出路在于调整公共资源的配置结构：假设如能将 2023 年供给端与供给侧 25.5% 与消费端 22.5% 的配置比例，调整为消费端 25.5% 与供给端 22.5%，在仍保障相当于 GDP 体量的 22.5% 资源支持高端制造业、新兴科技等新质生产力提升追赶的同时，可使消费投入提升 3 个百分点；加之消费增长对宏观经济的拉动效应，以及由此带来的居民收入增长二次推动，“十五五”期间将消费率就可能得到显著提升。假如公共资源支持投资供给侧长期目标是相当于 GDP 的 15% 投入规模，则约有相当于经济总量

10个百分点的相当庞大资源可通过不同方式用于改善民生与提振消费。

回顾新中国经济史，曾有三次通过政策调整推动消费率在短期内大幅提升的成功经验，这也为当前的政策优化提供了有益借鉴。若能抓住这一契机，将民生与消费置于更突出的位置，有望形成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新格局，我理解这与高层最新论述“供强需弱”提到的“转型”要求也是一致的。

王一鸣²：金融如何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当前供给侧的热点话题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我重点围绕三个方面探讨金融如何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一是聚焦科技创新，分析我国科技创新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以及提升原始创新能力需要推进的“三个转变”；二是延伸至产业创新，探讨近年来我国产业竞争力的变化及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驱动作用；三是探讨如何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并推进金融体系适应性调整，使其更好服务科技和产业创新。

2. 王一鸣：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核心要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必须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最关键的变量就是新一轮科技革命。新科技革命呈现以人工智能为核心，与量子科技、生命科学交叉融合、多点突破的发展态势。人工智能是新科技革命的核心驱动力，正在突破传统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带来众多产业领域的深刻变革和创新。量子计算最突出的优势在于运算速率。IBM正在推动量子计算机商用，我国也在加快这一进程。量子计算与人工智能的融合，将极大增强人工智能的运算能力。而生命科学与人工智能的交叉，就形成当前热度极高的脑机接口。

科技创新正在成为大国博弈角逐的主战场，改变国际分工的“中心—外围”结构，重塑各国经济竞争力消长和全球竞争格局。特朗普第二任期继续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领域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与压制，以确保美国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我们只有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才能增强在国际竞争中的主动权。

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2025 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 3.9 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2.8%，首次超过 OECD 国家平均水平。综合科技实力明显上升，国家综合创新能力排名由 2020 年的第 14 位提升至 2024 年的第 10 位，深圳—香港—广州跃居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自然指数 2025 科研领导者榜单显示，中国继续保持世界第一，反映中国基础研究科研产出的快速增长。

但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的创新体系仍有短板弱项。

一是原始创新能力不强。过去可以通过引进技术满足发展需求，缺乏从源头创新的动力。如今，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已经难以通过引进获取核心技术。我国重大原始创新偏少，与基础研究投入不足密切相关。2025年中国基础研究占R&D的比重为7.08%，远低于OECD国家15%~25%的水平。

二是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基础研究薄弱导致关键核心技术储备不足，对国外的依赖度较高，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等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

三是科技领军人才偏少。我国科技队伍规模世界最大，但顶尖科学家数量仍然不足。这也引发了科技界对“钱学森之问”

的持续探讨——为何如今拥有良好硬件设施的高校和专业科研机构，难以培养出科学大师？

“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强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原始创新导向，优化有利于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环境，产出更多标志性原创成果”。那么，怎么实现这个目标，我认为需要推进三个转变。

第一，从“跟跑”转向更多领域“并跑”“领跑”。跟随先进国家后面追赶，可以大幅降低技术路线选择和试错成本，但这种模式只能缩小差距，难以实现超越。随着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特别是美国推行“小院高墙”，搞技术封锁，继续“跟跑”已不现实，面向未来，科技创新要从“跟跑”转向更多领域“领跑”，在有较好科技基础、符合未来科技发展方向的方向性、前沿性领域，培育和形成领先优势，增强非对称反制能力和在国际科技竞争的主动

权。中国能否实现“领跑”，新能源汽车的突破给了我们信心，我国在电池、电机、电控系统都具有“领跑”优势，培育了华为、比亚迪、蔚来、小鹏、理想等汽车新势力。现在，西方老牌汽车生产企业反向与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合资，表明在新能源汽车这条新赛道上，中国实现了“领跑”。

“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在更多产业领域实现“领跑”。

第二，从终端产品创新转向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改革开放后，通过引进成套设备和终端产品，并对其进行适应性改造和再创新，中国形成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终端产品生产能力，如核电、水轮机、高铁、工程机械和通讯设备等，但承载关键核心技术的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软件等中间品仍是短板。“十五五”时期，要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

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

第三，从集成创新转向原始创新。原始创新就要从源头做起，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随着新科技革命下科学研究范式的深刻变革，基础研究转化周期明显缩短，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前移。

“十五五”时期，要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加大长期稳定支持，以基础研究的突破带动引领性原创成果、战略性技术产品的重大突破，在更多领域跻身国际国内领先行列。

产业创新是新质生产力重要载体

“十四五”时期，中国产业竞争力明显增强。人工智能等赋能千行百业，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加速应用推广，累计建成 3.5 万余家基础级、8200 余家先进级、500 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 15 家领航

级智能工厂，工业机器人新增装机量占全球比重超过了50%。中国“灯塔工厂”数量全球第一，占比超40%；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医疗装备等重点产业链取得了一批标志性成果。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2024年发布的《工业化的未来》报告。该研究基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模型与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揭示了中国从1980年仅占全球制造业5%的“追赶者”，跃升至2024年的31.6%，并将在2030年达到45%的惊人轨迹。同期，美、日、德三国占比将分别萎缩至11%、5%和3%，三国合计仅占19%，不足中国的二分之一。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还指出，“中国2023年安装的工业机器人数量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比亚迪2025年3月的市值超过了福特、通用和大众汽车的总和”；并认为按照目前的轨迹发展下去，中国很

可能最终完全主导高端制造业，从汽车、芯片到核磁共振成像仪和商用飞机。

因此，我认为中国制造业正经历一场深刻变革——从过去的成本优势向综合竞争优势转型。尽管当前我国制造业成本已不再具备显著优势，但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全球竞争力，这源于低成本优势向综合竞争优势转换。随着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链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数字经济和新能源优势等逐步形成，正在转化为新的综合竞争优势，推动中国经济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传统低成本优势是可以被替代的，但综合竞争优势很难被替代。

一是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超大规模市场带来的不仅是体量，更体现为超大规模经济效应。超大规模市场可以有效摊薄研发、生产、物流、营销等全链条成本，这也是西方难以理解中国产品高性价比的重

要原因；

二是完整产业链优势。中国已经建成规模庞大、配套齐全的产业体系，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完备的产业体系不仅体现为范围经济优势，还能形成丰富应用场景，促进创新成果市场化和产业迭代升级。

三是丰富的人才资源优势。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有 2.5 亿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 14 年。每年理工科毕业生超过发达国家理工科毕业生总和。人力资本条件不断改善正在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最具主动性的因素。

四是数字经济优势。我国新增工业机器人装机量占全球一半以上，5G 基站数量全球第一，目前正推进“5G+”应用并着手 6G 布局。

五是新能源优势。我国持续打破光伏晶硅电池效率的世界纪录，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达 60%，新能源发电量增量占全国新增发电量近 50%——而人工智能产业对能源需求巨大，这一优势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在新科技革命时代，科学研究范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牛顿时代，科学研究与产业发展相距甚远，分属两个相互独立的领域；而在当今人工智能时代，基础研究与技术研发之间的边界正日益模糊，基础研究的转化周期显著缩短，国际科技竞争的前沿正逐步向基础研究领域前移。未来，产业发展将越来越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深度融合。

走向未来，产业发展从根本上有赖于科技创新，没有科技支撑的企业，其发展空间将受到限制。“十五五”时期，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重点需

解决“一硬一软”。“硬”的层面，要加快布局一批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加大应用场景建设和开放力度；“软”的层面，要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允许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多自主权，建立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制度。

与此同时，要构建完善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建设市场化的科技服务和技术交易体系，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专业化市场化技术转移机构，加强技术经理人等科技成果转化人员队伍建设，形成支持科技成果转化的良好生态环境，让更多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从根本上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更多国家科技攻关任务，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鼓励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提高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

例。华为在上海青浦建设战略基础研究院，就是企业向基础研究领域拓展的典型案列，华为创新 2.0 的核心理念就是要打破传统的理论和技术的瓶颈，实现基础理论和新技术的创新，实现从 0 到 1 的突破。

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基本方向是智能化、融合化、绿色化

在智能化方面，“十五五”时期，一方面要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面向重点行业领域，加快工业互联网建设应用，扩大工业感知网络覆盖，打造海量物联接入能力。推动工业互联网与 5G、确定性网络、区块链、边缘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融合创新，加快实现工业数据的汇聚、分析和应用，推动工业互联网标识体系建设 and 标准规范制定，加快典型应用场景推广，提升工业互联网的行业赋能能力；另一方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加

快人工智能工程化产业化落地，将技术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

在融合化方面，要发展服务型制造。我国制造业以生产型制造为主，产业链条短，产品差异化不足，增值能力不强。发达国家制造环节增值占比不到40%，生产性服务环节增值约占60%。“十五五”时期，要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发展科技研发、工业设计、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等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力，促进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型。

在绿色化方面，要大力发展绿色制造，打造更多绿色车间、绿色工厂，建设低碳和零碳园区。加强ESG标准体系建设，构建绿色产品认证体系，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化转型升级。

推动“科技 - 产业 - 金融”良性循环

科技、产业、金融是三个独立运行又相互联系的领域，虽然有各自的运行范式、评价体系和发展规律，但同时又有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内在联系，形成互为牵引、双向作用的循环模式，并内嵌于所处的经济体系和发展范式之中。科技创新是科技、产业、金融循环的源头，发挥关键引领作用。科技创新为产业发展提供新技术新产品，是产业发展和产业创新的动力源泉；产业是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规模化应用的载体，产业创新难以脱离科技创新而自主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都离不开现代金融尤其是资本市场的支持。科技创新活动具有资金需求大、风险高、信息不对称、主体分散的特征，而金融市场有动员资金、风险管理、激励约束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可在加大创新投入、降低创新风险、提高创新效率等方面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科技、产业、金融互动关系是动态演进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兴起现代商业银行，为工业化提供了资金支持。第二次科技革命推动现代投资银行崛起，满足大规模工业化的融资需求。第三次科技革命，天使投资、创业投资、股权投资等直接融资方式成为重要推动力量，满足对科技型初创企业的早期投资需求。当前，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深刻改变产业和金融发展生态，迫切要求加快构建与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系。

从科学研究到产业化需要多个“惊险一跃”。科技创新往往始于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这一过程并不容易，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更为困难。从科学研究、技术研发、产品开发到大规模产业化阶段，整个过程充满不确定，不同阶段之间的转化都伴随着不同程度的失败风险。在这个

过程中，创新主体往往难以独自承担创新活动中的全部风险，需要通过风险分散和转移机制，实现风险在各参与主体间的合理分担。金融系统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分散和配置风险，通过多元化投资、拉长投资久期等进行风险管理，利用跨期资源配置工具、优化资产组合等方式降低和转移风险，实现各创新主体之间的风险分散和共担机制。

创新过程的不同阶段需要与之匹配的金融服务。按照生命周期理论，科技创新过程可分为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金融服务在不同阶段表现出差异性。种子期、初创期需要的资金规模相对有限，但要求资金有比较高的风险容忍度，以匹配科学研究天然存在的巨大不确定性。随着进入成长期、成熟期，科技创新不断走向现实生产力，对应的融资需求规模不断增加，同时投资回报的确定

性也在增加，而对资金风险容忍度的要求则趋于下降。随着企业从种子期向成熟期演进，资金需求规模逐步扩大，盈利水平逐步提升，风险水平则逐步降低——这两条曲线的变化，决定了不同阶段对金融工具的差异化需求。

我国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这种商业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对工业化城镇化高速扩张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现有金融体系面临的问题日益暴露，主要是金融服务供给与科创企业融资需求不匹配，主要表现为：一是风险不匹配，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存在不确定性，而商业银行追求收益确定性；二是周期不匹配，科技创新到产业化长周期需要用“长钱”，而商业银行倾向于给“短钱”；三是资金规模不匹配，科技型企业早期需要用“小钱”，而商业银行习惯于

给“大钱”；四是商业模式不匹配，科技企业以知识产权、技术、数据等无形资产为核心，而商业银行以固定资产抵押物确定贷款额度。由此可见，金融体系需要适应性调整。

与银行贷款相比，以股权、债券为主的直接融资模式更有利于科技与资本的结合，也是国际上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主流模式。适应我国经济由“房地产—土地财政—金融”循环的债务驱动发展模式，转向“科技—产业—金融”循环的创新驱动发展模式，需要在拓展商业银行支持科技创新空间的同时，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发展多元化股权融资，促进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建设适应科技创新需要的现代化金融体系。

为此，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第一，拓展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科技

创新的空间。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为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支持开展信用贷款、知识产权和股权质押贷款等业务。比如工商银行的“专精特新小巨人惠享贷”、农业银行的“专精特新小巨人贷”、中国银行“中银科创算力贷”、建设银行“产业园区贷款”、华夏银行“科技金融贷”、平安银行“科创贷”，等等。推动商业银行在科技资源集聚的地区设立科技分（支）行，依托科技支行探索开展认股权贷款等股债混合型融资模式。

第二，优化投贷联动模式。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前提下与外部投资机构深化合作，探索“贷款+外部直投”等业务新模式，推动金融服务在科技企业生命周期中前移，探讨投资收益抵补信贷风险的可行路径，改善科技金融的风险收益结构，实现风险与收益的跨期平衡。

第三，债券市场设立“科技板”。加大对科技型企业、股权投资机构和金融机构等发行科技创新债券的支持力度，为科技创新募集长周期、低利率、易使用的债券资金，提升债券市场对科技创新的适配性。同时创设科技创新债券风险分担工具，通过担保增信、直接投资等方式，支持股权投资机构发行低成本、长期险的科技创新债券。

第四，鼓励发展创业投资。科技部等七部委《加快建立科技金融体制、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若干政策举措》提出，设立“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拓宽创业投资资金来源，支持保险资金、企业年金、养老金等按照商业化原则投资创投基金，解决“募、投、管、退”中“募”的问题。同时，还需要畅通创投基金退出渠道。深入推进全面注册制改革，保持IPO和再融资常态化，给创投基金退出以

稳定预期。大力发展并购市场，鼓励设立市场化并购母基金。

近期，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正式启动，通过发挥中央资金引领带动作用，吸引地方政府、中央企业、金融机构、民间资本等多方参与，形成万亿元资金规模，通过投基金、投企业、投项目，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设置 20 年存续期，其中 10 年投资期、10 年退出期。通过更长久的投资期限，为企业提供长周期的资金供给；又通过更宽松的退出时限，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用耐心资本陪伴企业“长跑”，培育千行百业的“小巨人”和“独角兽”。

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设置“基金公司—区域基金—子基金”三层架构。区域基金通过“子基金+直投项目”方式投资，子基金占比不低于 80%，子基金平均规模不超过 10 亿元，70% 资金投向种子期和

初创期企业。京津冀区域基金由中金资本管理，长三角区域基金由国投创合管理，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基金由深创投管理，每只区域基金总规模均超过 500 亿元。基金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导向，重点投资估值 5 亿元以下的小型企业，单笔投资不超过 5000 万元，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生物制造和未来能源等硬科技领域。未来将推动在三个区域设立超 600 只子基金，服务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

第五，增强股权市场支持科技创新功能。优化科技创新企业甄别筛选机制，进一步提升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等服务创新型企业的水平。发挥区域性股权市场支持创新的积极作用，为创新型企业提供更加有效的融资服务。深化退市制度改革，简化退市程序，完善退市标准，推动形成市场化、常态化退出机制。

第六，完善融资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

通过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构建动态信用画像，提升金融机构的风险识别能力。健全科技型企业融资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完善科技型企业融资担保业务模式。完善再保险服务体系功能，为科技保险有效分散风险。探索地方政府对科创企业增信和风险补偿机制。

第七，加强科技对金融服务的赋能。

利用机器学习算法构建智能风控模型，动态评估企业的信用风险，降低金融机构的决策成本和风险。通智能投顾，为企业提供定制化的投融资方案，优化资金使用效率。通过区块链和数字货币技术，实现跨境支付和供应链结算的高效化，降低交易成本。

施康³：大国竞争与“十五五”人民币汇率展望

中国经济的许多变量具有内生性，不同的宏观政策会导向不同的经济结果。而宏观政策的制定，取决于对经济基本面的认知，既要立足当下，也要着眼长远。因此，准确把握经济基本面及人民币汇率走势至关重要。若我们判断人民币将进入贬值通道，货币政策便难以采取宽松取向；若判断人民币走势稳健向好，则可考虑实施力度更大、更为积极的宏观政策。因此，我认为这一问题极具探讨价值。

3. 施康：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教授、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特聘教授。

中美大国竞争的格局与决定性因素

我们常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前或许有人认为这一表述略显宏大，但如今愈发能体会其深刻内涵。地缘政治冲突频发，贸易战硝烟四起。尽管中美之间达成阶段性平衡，但近期有开始了针对半导体领域的 301 调查。与此同时，全球正迈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层出不穷。这些新技术一方面让我们仿佛置身于魔幻时代，诸多科幻场景逐步成为现实；但另一方面，也给社会带来了更大压力，“内卷”加剧，个体焦虑情绪上升。可以说，当前全球已进入“外乱内卷”的复杂状态。

从宏观经济层面观察，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处在外部冲击与内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同时面临新技术变革带来的影响，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阵痛期。部分群体认为经济发展态势良好，也有部分群

体认为经济实际体感欠佳，并非所有人都能从技术进步中同等受益。社会呈现出结构性繁荣与衰退并存的特征，这对政策的精准性与有效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我的研究领域是国际宏观，在我看来，现在影响全球经济格局演进的最核心变量，是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

中美两国此前长期处于优势高度互补的状态，合作是双方最理性的必然选择。2000年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中，中美两国均从中显著受益。美国的核心优势在于其货币霸权与深度资本市场，而中国的优势体现在完整的产业链和规模效应下的生产与贸易优势。在互补模式下，双方可各自聚焦优势领域实现共赢。但当前逆全球化趋势凸显，中美之间出现“脱钩”迹象，未来大概率将呈现局部脱钩、时好时坏的博弈格局。

2025 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关税战对中美两国都造成了伤害，但双方均展现出很强的经济韧性——美元仍是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宰，中国对外贸易依然保持强劲态势。短期内，两国仍将在现有互补结构下共存。从长远来看，美国势必会继续推进再工业化进程，但这一过程很困难，短期内美国制造业大规模回归的可能性并不大；与此同时，中国也必将在货币领域与资本市场层面，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方面继续加快步伐。

科技是竞争的主战场。中国的创新体系虽尚未完善，在原创能力及部分制度建设方面仍存在不足，但总体而言，中美两国各有所长。根据德国智库最新发布的研究成果，当前全球格局已呈现出中美两大国主导的态势，欧洲的影响力已显著减弱。美国在基础研究、芯片设计、通用大模型、医疗机器人等领域领先，中国的优势则在

智能电网、智能工厂、人形机器人、绿色能源等领域。当前科技竞争的焦点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决胜关键很可能在于基础设施建设。阿里巴巴的蔡崇信在香港的相关演讲中提到，尽管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具备诸多优势，但中国拥有完整产业基础与丰富的应用场景，其中电力供应便是重要基础之一。若无电力保障，便无法支撑数据中心的运行，而数据中心的缺失将直接制约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

尽管科技被视为中美竞争的主战场，但我认为决定两国竞争走向的关键并不在此，因为无论是科技还是军事层面，双方已形成均衡态势。

大国竞争真正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各国自身内部。美国面临的是不可持续的财政问题，具体表现为高通胀与高债务。此外还存在制造业空心化、美元信用持续流失等问题。其中，高债务是美国当前最紧迫

的问题，在高债务规模与利率居高不下的双重作用下，美国面临着巨额的利息支出压力。

中国内部的核心问题在于，以往依托土地财政、房地产与城市经营形成的闭环经济增长模式，虽在过去 20 年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制造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目前该模式已陷入负循环。这一问题也引发了通缩压力，物价持续低迷。当前，中国的财政体系与消费结构均迫切需要转型。

中美两国均需着力解决自身内部问题，谁能更早地解决这些问题，谁就能在大国竞争中迈出关键性的一步。

关于大国竞争的路径，我们应如何开展竞争？我认为在“十五五”这一关键时间窗口，金融、货币领域（包括资本市场的重点突破）是非常重要的发力方向。如

木桶理论所揭示的，一个木桶的盛水量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

如今，科技已不再是我国最痛的短板，至少处于中等水平，甚至已接近领先水平。而金融与货币领域则是我国当前的竞争短板。因此，高度重视并加大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改革力度，具有极强的现实必要性。习近平总书记适时提出建设金融强国的要求，金融强国包含六大核心要素，其中首要要素便是强大的货币。

“十五五”期间人民币升值的逻辑与意义

人民币汇率在某种意义上是大国博弈的关键指标，也是建设金融强国的突破口与关键点。因此，研判“十五五”期间人民币汇率走势非常必要，这不仅关乎对外贸易与货币政策，更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密切相关。

众所周知，中国有一个制约性问题：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个人购汇仍受5万美元额度限制，资本外流的担忧依然存在。但如果我们能对“十五五”期间人民币汇率形成清晰的判断，若人民币持续走强，我们还需如此担忧资本外流问题吗？我认为当前正处于重要的关键时间窗口。

我之所以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们都需要认识到——如今已迎来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绝佳时机。当前我国具备坚实的经济实力，对外贸易顺差表现优异，而房地产市场处于相对低迷的状态，这一时期正是开放资本账户的最佳契机。若错失此次时机，我们或许还需再等待10年、15年，甚至更久。作为经济学家，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有义务为此发出呼吁。

回顾人民币汇率的历史走势，自2005年汇改启动以来，人民币曾长期处于升值通道。这一时期亦是中国经济的黄金发展

阶段，人民币升值吸引了大量外资流入。2005年至2014年期间，人民币缓慢升值，彼时中国房地产市场与人民币汇率均处于最佳状态。2014年之后，人民币出现适度贬值趋势，基本在7的水平上下波动。两个月前我在社科院演讲时，针对我提出的人民币将升值的判断，仍有许多争议。而从这两个月的市场发展态势来看，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包括美国高盛、摩根等大型金融机构，都已形成类似判断，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甚至认为人民币汇率可能升至5的水平。现在升值趋势已然明确，预计2026年人民币汇率将很快突破7。

理论上讲，汇率与经济基本面应呈正相关关系，但过去10年间，人民币汇率表现与经济增长完全背离，所以我认为，人民币汇率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是被低估的。

人民币汇率的长期走势是由两国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十五五”期间，人民

币升值将有坚实的基本面支撑，包括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前沿科技领域不断突破，产业优势日益凸显，超大规模市场与高水平对外开放，正日益成为支撑人民币走强的重要力量。我国宏观政策此前总体保持相对保守的基调，这为我们预留了充裕的政策操作空间。当前正是运用这些政策空间的适宜时机。作为中美大国竞争的关键决胜期，“十五五”乃至“十六五”这5-10年有必要充分发挥政策效能。

若以2014年为基期，将中美全要素生产率均设定为100，可发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持续上升，而美国则相对平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已超过美国，仅表明增长速度快于美国。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实际水平仅为美国的20%左右，因此仍有巨大的增长空间。

国际专利申请更能反映真实的创新水平。从全球国际专利申请数据来看，中国

目前已远远领先于美国。这一对比基于统一标准，相对客观的。

中国拥有人才优势与工程技术优势，而美国制造业回流面临的¹最大阻碍之一便是工程师人才短缺。美国或许在部分特定领域拥有较多高端人才，但真正愿意进入工厂从事工程技术工作的人才数量严重不足。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占比已稳定达到 30%，这些优势均为中国经济发展与人民币走强提供了坚实支撑。

在贸易、货币与财政等领域，我国始终推行稳健的政策，这为政策扩张带来了广阔空间。

中国对美国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持续下降，我认为这一趋势具有积极意义。这意味着在大国博弈的过程中，我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不断降低。以往美国之所以在双边关系中占据优势，主要在于其曾

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与市场。如今，美国已不再是中国的最大市场，其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性持续下降，这使得中国在中美博弈中逐渐掌握更多主动权。这也是中国在此次对等关税反击中展现出坚定信心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对外贸易领域，热议的“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已成为出口增长主力，2025年又涌现出“新新三样”，即人工智能、机器人与创新药。2025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出口额已达到800亿美元。过去，中国制药行业主要为美国生产原料，而如今，中国已实现药品专利的出口。把握这一发展趋势，不仅有助于增强对国家发展的信心，也能为个人投资决策提供有益参考。

2025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呈现出口地区的多样化和出口商品的高端化。这一事实已成为国际社会关

注的焦点，同时对人民币形成了升值要求。当前，正确认识中国的贸易顺差具有重要意义，而客观而言，人民币适度升值具备合理性与必要性。

人民币汇率作为核心资产价格，其走势对市场预期有重要影响。中国经济面临的很多问题其本质都是预期与信心问题。中国居民拥有庞大的储蓄规模，在当前全球资本市场“东升西降”的情况下，若能形成明确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将对资本市场与房地产市场产生积极影响，也将为今后一段时期的各项改革创造稳定的市场环境，有助于稳定中国经济的发展信心与改革推进的能力。同时，这也将助力中国从出口大国向进口大国、消费大国转型，这是我国长期的发展战略方向。

更重要的是，人民币升值将为资本账户开放创造有利条件，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流通，最终实现人民币的可

兑换。这将使中国不仅在生产制造领域保持优势，而且在金融与货币领域形成优势，从而不再受制于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

人民币升值有坚实的经济基本面支撑，对整体经济发展有正面意义。当然，人民币升值也可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我们可以通过其他支持手段来缓冲。

总体而言，我认为人民币升值趋势是很清晰。因此，我国当前的宏观政策应更为积极宽松。

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所述，我想提出两点建议：

建议一：货币与财政政策进一步宽松

我国当前推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但其力度远远不够。我认为，应明确倡导适

度通胀目标。原因在于，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在房地产市场，黄金、白银、铜等资源价格均在上涨，为何房地产相关资产价格未能同步上涨？正是因为通胀水平尚未达到合理区间。一旦通胀水平上升，市场将自动恢复对房地产的支持。

若单纯依赖政府救市政策（如放宽特定区域购房限制等），其效果将十分有限。唯有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才能真正挽救房地产市场。唯有房地产市场实现稳定，地方政府财政才能趋于稳定，中国资本市场才能逐步走强，中国经济也将实现更为健康的发展。

中国经济呈现K形复苏态势，K字的上面一撇代表科技、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下面一捺则是普通民众的经济体感。我们必须确保这一捺的稳定回升，不能一直向下。

建议二：中低收入倍增计划

关于消费提振，尽管现在推行了“以旧换新”等政策，但我认为其效果相对有限。更重要的是要拿出实质性的财政支持措施，通过真金白银托底基本盘，稳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可采取的政策手段丰富多样，例如直接发放现金、消费券、税收减免、转移支付、提高农村基础养老金、与社保联动上调等。唯有如此，才能全面恢复消费信心与资本信心，稳固经济基本盘。

我坚信，人民币在“十五五”期间一定会升值。这将对提升中国经济信心产生积极作用，并为各方提供具有前瞻性与指引性的参考。在此背景下，我国政策应更为积极，同时我们也应更为正面地看待中国经济发展前景，这将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何晓贝⁴：促进物价合理回升有必要成为货币政策的硬指标

回顾 2025 年，全球贸易格局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成功抵御了外部压力，出口规模更创下了历史新高，全年 GDP 预期实现年初 5% 左右的目标。这一成果得益于中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积极的政策措施，有效应对了国际市场的挑战和不确定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自 2025 年下半年起，投资和消费的增长都出现乏力的迹象。更重要的是，价格指标显示总产出连续多年低于潜在水平。

4. 何晓贝：北大国发院副研究员、国发院智库宏观与绿色金融实验室副主任，2025 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观察报告报告》执笔人。

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并强调“将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然而，如何通过宏观政策推动物价合理回升仍面临较大挑战。尤其关于货币政策的作用，各界观点分歧明显。

本期报告讨论分析了2025年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 and 政策环境，并在展望未来的基础上，对货币政策支持物价合理回升提出建议。

宏观经济运行特征与政策态势

（一）经济运行的三大核心特征

2025年中国宏观经济呈现鲜明的结构性特征，增长动力与潜在风险并存。

第一，出口拉动效应显著。尽管美国对中国商品的有效关税税率已从11%升至

29%，但截至 2025 年 11 月，中国出口总额仍实现 5.4% 的同比增长，净出口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29%，创下 1997 年以来的历史高位（2020 年疫情期间除外）。这一方面显示中国产品的高度竞争力，另一方面也反映 2018 年以来中国出口市场结构的逐步调整——部分出口份额从美国转向东盟及其他新兴市场，有效对冲了单一市场的贸易壁垒冲击。

第二，增长动能前高后低。2025 年前三季度 GDP 增速为 5.2%，但四季度呈现放缓态势，10-11 月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速较年初下滑，市场预计四季度 GDP 增速约为 4.5%。内需不足问题尤为突出：固定资产投资截至 11 月累计下滑 2.6%，是除 2020 年疫情外的首次同比下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月度环比增速（经季节调整）下半年多数时间为负，截至 11 月累计同比增长 4.0%。

第三，物量与价格指标背离。这是2025年经济运行最值得关注的现象：在GDP增速保持稳健的同时，物价水平持续低迷。截至11月，CPI同比增速已连续33个月低于1%，PPI连续38个月处于收缩区间，而反映整体价格水平的GDP平减指数更是连续十个季度为负，这是20世纪90年代有统计数据以来的首次。物价低迷也影响实际汇率：尽管2025年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升值了4%，但由于连续几年国内通胀水平显著低于主要经济体，2022年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下降了20%左右。

总体而言，中国经济5%左右的增速在全球范围内仍显突出，但从价格指标和劳动力市场情况来看，实际产出明显低于潜在经济增长水平，即产出缺口为负。持续为负的产出缺口是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大量研究表明，产出缺口持续为负

会带来迟滞效应（hysteresis），例如，长期失业会导致工人技能贬值（人力资本折旧）并脱离劳动力市场，从而使失业率难以回归到原有均衡水平。换句话说，即使经济衰退主要源于需求冲击，严重且持久的衰退往往会对供给造成长期负面影响，通过人力资本损失、劳动力参与率下降等渠道，导致潜在产出永久下移。

（二）2025 年的宏观政策力度

2025 年，中国的财政政策相较往年有积极的转向，而货币政策则相对保守。

具体而言，在财政政策方面，无论是考虑官方口径的赤字率，还是包括地方政府专项债、特别国债等的广义口径的赤字率，均较 2024 年高出 2 个百分点，且高于 2020 年疫情期间水平。更重要的是，财政政策导向开始有所转变，从过去侧重基建投资的“投资于物”模式，部分转向

支持消费、民生的“投资于人”：包括发行 3000 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每孩每年 3600 元育儿补贴，推进学前教育免费等民生举措。此外，5000 亿元特别国债的发行用于补充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为金融系统稳定提供了有力支撑。

然而，2025 年的货币政策基调整体偏保守。尽管 202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导向，但 2025 年政策利率只下降了 10 个基点。由于通胀水平很低，实际利率仍处于较高水平。例如，十年期国债的名义收益率从 2023 年以来持续下降，但剔除通胀后的实际收益率高于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又例如，剔除通胀后的实际贷款利率与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持平，然而同期实际 GDP 增速显著下滑——这意味着尽管经济体平均回报率下降，实际借款利率并未相应下行。这显示货币

政策并未明显发挥“逆周期”调节的作用。

政策争议：促进物价回升与货币政策的困境

中国的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物价回升中应当发挥关键作用，但对于货币政策宽松的有效性、必要性，各界仍存在较大争议，主要集中在三个核心问题：

争议一：物价持续低迷能否自我修复？

部分观点认为，物价低迷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阶段性现象，随着市场自发调节，经济可逐步走出低通胀。但国际经验不支持这一判断。

从理论逻辑看，物价持续低迷是产出缺口为负的直接体现，长期产出缺口为负会对经济造成不可逆损害。通缩环境下，债务人实际债务负担加重，会延长经济去杠杆周期，抑制投资和消费；同时，物价

下跌容易与工资形成螺旋式下行——企业利润受损难以提高工资，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导致消费意愿减弱，最终形成“物价不涨—工资停滞”的恶性循环。

日本的教训尤为深刻：其居民通胀预期长期锚定在零，企业不敢提价，员工工资增长乏力，形成了零通胀的均衡，即便经过多年政策调节，也难以有效打破。中国已出现类似苗头，统计局数据显示城镇单位平均工资增速从2021年以来显著下滑，与物价低迷走势高度吻合。更关键的是，通胀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是“对未来通胀的预期”，因此通胀具有“自我实现的预言”效应：一旦企业和居民形成“物价不涨”的固化预期，就会推迟消费、减少投资，导致预期变为现实。而预期的扭转往往很困难；日本、欧洲在近几年走出长期低通胀，主要依赖疫情与地缘政治造成的外部冲击，这也印证了市场自发调节难以打破低通胀

均衡的现实。

争议二：“供强需弱”环境下，货币宽松是否会加剧产能过剩与物价下跌？

中国人民银行在 2025 年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提出，在侧重投资、保障供给的发展模式下，增加货币供给可能导致产能和供给持续扩张，加大供过于求矛盾，反而不利于物价回升。部分学者也认为，中国投融资结构失衡，宽松货币更多流入生产部门而非居民部门，可能进一步加剧供给过剩与消费不足。

这一观点需要客观辩证看待。不可否认，市场扭曲会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效率——部分国企预算软约束、僵尸企业存在等问题，可能导致资金流入低效部门，加剧局部产能过剩。但这并非整体通缩的根源，也不能因此否定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整体效果：

首先，投资本身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宽松推动投资会加剧供给过剩”的假设，是建立在资金大量流入预算软约束的部门的基础上，但这一情况已显著改善：地方政府曾经是主要的预算软约束部门，但在化债推进以后已经成了加剧紧缩的源头。与此同时，局部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不足以引发整体通缩，部分行业的恶性竞争应通过行业性监管政策解决，货币政策应聚焦整体物价水平，不能因局部问题束缚总量调节的手脚。

其次，货币宽松对居民部门的惠及，不应体现在“新增居民贷款规模”，更要重视利率下降给居民带来的减负效应。从国际经验来看，房价大幅下跌后居民部门去杠杆是正常的过程，目前中国居民部门正处于去杠杆周期，房贷余额占 GDP 比重已从 2020 年 33% 降至目前的 27%。对于存量房贷持有者而言，降息可显著减

轻债务负担——当前银行体系个人住房贷款余额约 37 万亿元，若房贷利率下降 100 个基点，每年可为居民节省利息支出约 3700 亿元。

争议三：宽松的货币政策压缩银行利息差是否危及金融稳定？

制约央行进一步降息的关键因素，是对银行净息差（NIM）收窄的担忧。过去十年，中国商业银行净息差从 2015 年的 2.5% 逐步收窄至 2025 年的 1.4%，而利润是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的主要来源，息差收窄引发了对银行财务稳健性的关切。

但这一担忧存在两个认知误区：

第一，低利率环境并不必然导致净息差极度压缩。美国 2008 年后实施了七年零利率政策，银行业仍保持 3% 以上的净息差；而在 2002-2006 年加息周期中，美国银行业净息差反而从 4% 降至 3.5%。净

息差本质上反映银行的风险定价能力——通过提高风险溢价覆盖实体风险。中国当前利率体系存在扭曲，部分企业贷款利率甚至低于国债利率，这并非低利率政策的必然结果，而是货币政策体系碎片化等多重因素导致的。

第二，净息差的“安全底线”并非绝对。跨国比较显示，过去十年欧元区银行净息差维持在 1.4%-1.6%，日本更是低至 0.5%-0.7%，均未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日本银行能够承受极低息差的关键，是其在 20 世纪 90 年代银行业危机后，通过财政资金补充银行资本金，彻底处置不良资产，修复了资产负债表。中国 2025 年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大行资本，正是朝着这一方向迈进，但仍需进一步解决潜在不良资产问题。

更值得警惕的是，通过维持高息差保障银行利润的做法，会造成交叉补贴——

让优质借款人补贴低效企业，模糊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的职能边界。金融稳定应依靠宏观审慎监管与风险处置机制实现，而非牺牲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对货币政策促进物价合理回升的政策建议

为确保“十五五”期间经济增速维持在合理区间、实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必须着力防止经济长期运行在潜在产出水平之下、对潜在增长率造成永久性损害。展望2026年，经济运行面临的挑战依然显著。推动物价合理回升，缩小产出缺口，应是当前宏观政策的核心任务，需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高效协同。其中，货币政策需突破当前困境，发挥更大作用。为此，提出以下四点政策建议：

（一）将“促进物价合理回升”明确

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

当前货币政策受限的关键，在于目标模糊性导致政策立场易受干扰。应从三个层面明确目标定位：

一是将“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确立为货币政策“首要”目标。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其列为“重要考量”，建议提升至“首要”目标的高度，避免因多重目标冲突影响政策立场。

二是设定有约束力的通胀目标。2025年两会将通胀目标从3%以内下调至2%，这一调整更为务实，应将其作为具有约束力的政策指标。政府部门（包括央行）需作出明确承诺并采取切实行动，避免市场形成长期低通胀预期。

三是回归总量政策定位。货币政策的
核心职责是应对通胀这一宏观全局性问题，
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应通过行业监管、信贷

结构调控等手段解决，不能成为制约总量政策的因素。

（二）货币政策应着力于降低无风险利率，淡化对数量指标的关注。

货币政策应从侧重信贷规模等数量管理，转向以利率调节为核心的价格型调控，具体包括：

一是进一步降低短期无风险利率。当前中国短期无风险利率仍有较大下降空间，降低银行间市场政策利率，可推动存款利率下行，降低银行负债成本，缓解净息差压力，同时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二是淡化对信贷数量指标的考核。在房地产下滑、居民去杠杆的背景下，信贷增速放缓是正常周期性现象，不应将其等同于货币政策失效。数量型信贷扩张容易导致银行承担过度风险，反而不利于金融稳定与资源优化配置。

三是重视存量债务的利率调整。针对居民房贷、企业存量贷款等，可通过市场化方式推动利率下行，缓解债务—通缩循环。

（三）鼓励银行差异化竞争，避免考核指标同质化和僵化。

当前银行业务模式高度趋同、考核指标同质化，削弱了银行风险定价能力，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应着力优化政策环境：包括减少行业性考核指标、鼓励差异化竞争。过多的行业导向型考核（如特定领域信贷增长要求），会导致信贷资源过度集中，加剧风险集聚。鼓励银行根据自身禀赋、客户基础和风险偏好开展差异化竞争，为银行拓展自主风险定价空间创造条件。银行自主风险定价机制的形成，也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关键环节。

（四）厘清“物价稳定”与“金融稳定”

的政策边界

人民银行应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双支柱框架下，明确划分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两大目标的政策边界，物价稳定职能归货币政策，金融稳定职能回归宏观审慎管理体系。银行净息差收窄、汇率波动、银行间市场风险等问题，应通过完善宏观审慎工具箱、强化金融监管、建立健全风险处置框架来应对，而非依赖货币政策调控。人民银行应进一步丰富宏观审慎工具箱，强化其识别与预防金融风险的能力，从而将货币政策从金融稳定目标中解放出来，专注于稳增长与稳物价。

02.

报告精要

编者按：

中国经济宏观层面的“供强需弱”矛盾，在微观层面体现为大量真实生活需求因表达成本高、识别难度大而长期“沉默”。如何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识别、可测量的经济变量，成为贯通宏观政策与微观基础的关键命题。

北大国发院课题组于2026年1月发布的《2026生活经济报告》，独到地提出“生活经济”这一分析框架：以个体微观生活需求为起点，借助数字技术，将分散、隐性的生活需求显性化，通过“表达—连接—



激发”的需求侧循环，与“发现—匹配—创造”的供给侧循环，实现供需精准对接。

报告以小红书等平台为样本，基于对UGC内容社区的深入观察，为理解数字时代的消费升级与内需动力提供了微观理论基础，也为破解供需错配、治理内卷式竞争、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循路径。

北大国发院 2026 生活经济报告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30th
Anniversary
1994-2024



北大国发院 2026 生活经济报告⁵⁶：

一、为什么需要生活经济？

从外部来看，中国自加入 WTO 以来，产能一直在全球释放。但全球需求的扩张很难与中国经济的供给能力同步，尤其是中国很多产业本身也存在结构性的差异，因此产能过剩不仅成为国际贸易和投资问题，还上升为国际政治的议题。全球南方国家的消费能力一直难以提升。这也是中国在几年前就战略性地提出以双循环构建

5. 课题组成员：谢绚丽、沈艳、邢亦青、吴彤、吴嘉宝、唐旭、杨璐。

6. 此文为报告精要，报告全文 3 万字。请关注“北大国发院”微信公众号，发消息“生活经济报告”获取报告全文。

新发展格局的内在逻辑与外在趋势。

另一方面，个体有效需求不足及其引发的供需错配、价格内卷等问题日益凸显。以消费为基础的内需扩张被置于更高的战略位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通过“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来带动需求释放与结构升级。在此背景下，生活经济研究的必要性不仅在于为“提振消费”提供新的分析框架，更在于为“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提供可操作的微观基础与政策工具。

二、什么是生活经济？

生活经济，是指个体的生活需求通过数字技术被表达、连接和激发，形成供需良性互动和增长的经济形态。具体来说，它以居民生活中的微观需求为起点，借助数字平台及其相关技术对需求进行识别、放大与结构化表达，进而引导高质量供给的供需协调的新范式。

当经济迈入特定阶段，增长的核心动能由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中国经济已从“有没有”的总量阶段和“大不大”的规模阶段，进入“好不好”的质量跃迁期。如何通过促进和形成国内稳定、可持续的有效需求，并反向塑造改善供给结构成为时代命题。因此，发展到这一阶段，经济运行亟须建设新的需求导向范式：以需求增长驱动经济增长，通过精准识别、持续反馈并动态响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个性化需求，促进高质量供给，并形成需求与供给相互促进的正向循环。这一范式的核心不在于简单放大消费量级，而在于降低信息摩擦、提升供需匹配效率，使“人的真实生活需求”成为资源配置和供给创新的起点。这一转向，构成了当前扩大内需政策逻辑的深层基础，也为理解“生活经济”形态提供了现实出发点。

三、如何建构生活经济？

构建生活经济，本质上是数字空间对供需协调范式的重塑。相较于传统互联网平台侧重于存量需求的标准化满足与流通效率提升，生活经济的核心逻辑在于对基于个体生活场景对“潜在、微观、非标准化需求”的微观捕捉，使散落在日常生活碎片中的隐性需求得以“显性化”：

首先，普通个体的生活在分享中被“表达”；其次，表达出的生活需求通过“连接”产生互动；最后，在网络外部性与参照系效应下更多个体对美好生活向往被“激发”，从而完成从微观生活到宏观内需增长的动力转化。

四、如何实现生活经济？

内需不足有时并非消费者缺乏购买力，而是“好东西找不到需要的人”，“想要

的人也不知道好东西在哪”：即“有效的供给”无法找到“有需求的消费者”。

因此，破解“内需不足”的一大关键在于让供给与需求的匹配更加精准。通过“发现需求 - 匹配供需 - 共创供给”的完整链路，推动供给体系从“生产导向”向“生活导向”转型，实现高质量供给与美好生活需求的精准对接。

这一关键，在于打破传统商业中“企业主导生产、消费者被动接受”的线性模式，让消费者们的生活需求深度参与到供给的全流程中，形成“需求驱动供给、供给反哺生活”的良性循环。从供给侧视角，生活经济已经在深刻重塑供给端。

五、简要总结与政策建议

生活经济“以人为本”，服务于“美好生活”的目标，通过技术赋能，不断促

进消费需求的增长与供给质量的升级，其价值可进一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加以理解。

在空间维度上，生活经济首先在承认市场分层与地理、文化差异性的客观前提下，发挥了高效的聚类与扩散作用。线上平台承担需求提炼、经验总结和决策支持的功能，线下则完成真实消费与体验闭环。这种线上线下协同，使需求不止停留在表达层面，而能转化为可持续、可复制的实际消费行为，避免了脱实向虚，并推动了线上线下的均衡发展。其次，生活经济实现了供给光谱向“服务与体验”的延伸。平台不仅优化了实物消费，更深入改造了服务型与体验型供给。在此过程中，技术不仅用于匹配供需，更用于提升服务供给者本身的能力水平，通过经验沉淀提升了劳动力要素的质量（Lucas，1988），实现了服务型供给的内生性优化，有助于促

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

在时间维度上，生活经济具备内生驱动的稳定性和生命力，不仅有助于提升消费的品质，也有利于供给的高质量发展。

首先，生活经济将需求锚定于个体的审美、生活方式与性格塑造，相比受即时情绪与价格驱动的波动性需求，这种基于生活本质的动力是根深于个人的慢变量，具备平稳性特征。“以人为本”的需求发自个体本身，而非外部价格诱导。这类需求根植于个体审美、生活方式和性格偏好等慢变量，往往呈现出内生性和多样性，随个体生命周期逐步演化，但不易被快速替代或耗散，因而具有较强韧性和可持续性。这种源于自我实现的动机，赋予了市场在经济波动中更强的防御能力与增长后劲。

其次，以人为基础的社交互动过程伴

随大量经验分享、对比与讨论，消费决策更趋理性，实际成交更接近真实偏好，退货率和“后悔型消费”显著降低。这使得需求在时间序列上呈现出“单向有效”的特征，即从认知、评估到消费的路径更完整，消费结果更可预期，整体上提高了有效需求的质量，使每一笔消费都成为社会财富的有效积累，而非资源的无效损耗（Ellison 和 Fudenberg，1995）。

最后，生活社区天然具有高信息密度的交流属性，这种基于真实体验的交流与公开讨论降低了信息不对称，使供给方获得更精准的需求洞察，促进了供给端的创新和差异化发展。同时，消费者并非一次性博弈的接受者，通过集体反馈机制，市场博弈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受声誉约束的长期关系契约（Baker 等，2002）。供给侧长期处于可被观察、被评价的状态，倒逼其回归品质本位，实现可持续发展。

基于上述对生活经济的基本结论和认识，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鼓励发展生活经济，加强对于生活大数据的捕捉和利用，推动需求侧和供给侧共同升级与适配。一方面以精准的需求画像赋能供给侧企业，确保广大中小企业能够平等地获取深度市场洞察能力，从实现供需的精准匹配，提升创新能力，开展差异化竞争。另一方面通过动态的微观数据追踪，加强对于宏观需求的把握，进一步增强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政策的精准调控。

第二，通过发展生活经济，强化线上线下协同创新，促进虚拟社区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政策层面应积极鼓励虚实融合的商业模式创新，利用数字社区的兴趣纽带盘活线下存量资产。应支持企业利用线上内容生态进行场景化营销，将虚拟世界的流量精准导向线下实体店、手工作坊及

城市公共空间，推动“线上种草、线下体验、反哺线上”的闭环发展。通过设立线下创新实践基地、支持新型消费场景建设，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在生活方式层面的深度耦合，从而以多元化的供给形式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复杂需求。

第三，深化生活经济中的“产销共创”机制，构建平台驱动的个体创新孵化体系。为进一步降低个体创业者与微观创新主体的准入门槛，应出台专项政策鼓励“消费者-生产者”共创模式的制度化发展。建议转变传统的补贴发放方式，探索“政府引导、平台承办”的扶持模式，通过向具备孵化能力的数字社区提供政策性补贴或税收优惠，激励平台为个体创新者提供技术工具、流量扶持及供应链对接服务。这种模式能够充分发挥平台的规模效应与资源整合优势，将分散的个体创意转化为标准化的商业供给，构建一个低门槛、高活力的民主

化创新生态。除了改变补贴的模式外，建议扩大国家补贴政策的范畴，将生活经济领域的服务性产品以及体验性产品加入补贴类目，自上而下进一步激发生活经济活力。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供给端，该模式对供给端的组织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政策可以进一步支持供给侧加强柔性生产能力，并且在提升供给匹配效率的同时，实现“快速响应”与“持续积累”之间的动态平衡。

第四，前瞻性布局人工智能对生活经济的赋能与治理，重塑数字连接效率。应高度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对生活社区分享生态与供需连接方式的深层变革。AI 技术不仅能显著降低个体与小微企业的内容创作门槛，提升生活场景的数字化呈现效率，更将通过更智能的语义理解实现超精准的供需匹配。政策上应鼓励开发面向生活经济场景的垂直领域大模型，辅助中小企业

进行产品定义、视觉呈现与口碑管理，使其在智能时代具备更强的市场响应能力。同时，需同步建立健全针对 AI 生成内容的标识与真实性治理体系，防范虚假信息对生活社区的干扰，确保技术进步不削弱社区内容的真实性基础，引导 AI 技术在提升效率的同时，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对真实美好生活的追求。



03.

管理课堂

编者按：

当技术迭代重塑产业逻辑、市场从增量转向存量、组织焦虑从边缘蔓延至核心，管理实践正面临双重追问：在不确定性成为常态的今天，领导者靠什么稳住方向？在 AI 日益替代脑力与体力的趋势下，人的独特价值究竟何在？本栏目所选两篇文章，从不同维度回应了上述命题。

北大国发院校友学院发展基金讲席教授杨壮的文章提出“勇气”这一被忽视的领导维度，将其从传统的敢打敢冲升华为内在的精神能力结构，提出自驱、自控、洞察、创造、坚毅“五力模型”，为管理



者提供了一套可内省、可修炼的能力框架。

北大国发院管理学助理教授侯宏则从心力切入，将企业家精神拆解为初心、耐心、细心三重修炼，明确指出 AI 虽可以替代智力却无法替代那种为尚未发生的问题提前“赋予答案”的笃定。

两位老师共同认为，在 AI 时代，组织的终极竞争力并非源于可被计算、优化或外包的脑力与体力，而恰恰是那颗无法被量化的“心”。这既是管理者应对复杂挑战的内在支撑，也是企业不可复制的战略资产。

杨壮：勇气领导力——重塑 AI 时代的企业家精神

侯宏：AI 时代企业家心力的三重修炼



杨壮⁷：勇气领导力——重塑 AI 时代的企业家精神

在当今商业环境中，“勇气”正在被重新定义。它不再是 30 年前创业者的豪气冲动和“敢为天下先”的企业家精神，也不是面对风险的短期冒险或把握机会的突出技能，而是一种在深度不确定时代愈发稀缺的能力——在迷雾中做出清晰判断，在混浊中找到前进方向，在内卷躺平中保持定力，在复杂环境中引领组织稳步前行。勇敢聚焦行动，敢打敢冲，是一种外在胆识特质；勇气是一种内在品质，一种精神和心态，通过体验、反省、磨炼而形成。

7. 杨壮：北大国发院校友学院发展基金讲席教授、国发院 BiMBA 商学院原联席院长。

过去 20 年，勇气往往被等同于胆识与闯劲：企业家凭借果敢抢跑市场，机会充裕、规则宽松、增量可观。那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敢者迅速捕捉机会，企业因此快速成长。然而，如今的环境已截然不同。全球格局复杂多变，国内市场从增量转向存量，产能过剩，房地产下行，消费者行为正在重塑。与此同时，组织的学习速度不断被技术革新推高迭代。尤其是 AI 的快速发展，不仅重塑产业格局，更触及社会结构——职业重组、价值迁移、焦虑蔓延、机器替代，人和组织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这样的“深度流动”时代，勇气不再是向外冲锋的莽撞胆识，也非性格一时的爆发，而是一种深植于内心的精神力量——向内稳住、自我掌控的心理力量。它是一种深思熟虑的行动力：在混乱中保持内心平和、在噪声中识别趋势、在长期未知中保持耐性、在危机中发现机遇。面

对 VUCA（不稳定、不确定、复杂、模糊）环境，勇气承认危机与恐惧，却能以淡定和坦然回应。正如马克·吐温所言：“勇气是抵抗恐惧、掌控恐惧，而非无所畏惧。”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核心议题已从“能否生存”转向“如何持续生存”。增长不再依赖要素红利或速度红利，而在于认知升级、组织重构和价值体系的长期指引。对于中国政府而言，人口红利消失，经济发展重心已从房地产转向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在新常态下，如何推动深层次的政治、经济、法治和市场改革，为企业家创造一个积极、赋能、可持续的生存与发展环境。

随之而来的，是勇气内涵的提升。勇气不再是单纯的“敢不敢做”，而是看清真相、认清趋势、打破思维局限、推进组织文化变革，并在不确定中持续行动。早年的勇敢强调外显特质，而今日的勇气是

一种内在品格：在情绪波动中保持稳定、在外部生态不完善时自我驱动、在信息噪声中辨明方向、在漫长的不确定期中保持耐受力。

从哲学到实践：让勇气落地的五大力量

勇气并非简单的鲁莽或无畏，而是一种在价值与现实张力中保持方向的能力。纵观东西方古今思想与现代组织研究，勇气在领导实践中呈现出三重内涵：价值定力（对“应守”的坚持）、情境智慧（对“何为恐惧”的判断）和承担脆弱性的能力（在不确定中承担风险并推动变革）。这些维度共同构成了当代领导力理论与实践可操作的勇气框架。

在东方传统中，孟子的“三不动心”提供了道德与人格层面的最高纲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一命题强调领导者面对诱惑、逆境与胁

迫时的道德定力：不为权势与私利所动、在贫困或困境中坚守正道、在压力面前不屈服于不义。孟子将勇气与人格、使命与公正紧密相连，强调的是一种根植于伦理与责任感的稳定性。

西方古典传统则把勇气与智慧和自我忠诚并置。苏格拉底主张，勇气是“知道什么值得恐惧、什么不值得恐惧的知识”——它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对恐惧对象的辨识力与判断力。苏格拉底以“忠于内在指引（daimonion）”并甘受刑罚的事实，说明勇气还意味着对真理与良知的忠诚，这是一种来自内心的道德觉醒而非外在权力的体现。

现代领导学把这些古典洞见带入组织实践。肖恩·汉纳（Sean P. Hannah）的研究强调，勇气是一种能力结构，即在情境压力下仍坚持做正确之事的实践能力。这把勇气从人格特质转向可培养、可

评估的行为技能。埃德加·沙因（Edgar Schein）则提醒我们，组织变革的核心往往是心理安全问题，领导者必须愿意暴露脆弱、承受短期矛盾，才能推动深层文化改造。罗纳德·海菲兹（Ronald Heifetz）进一步指出，面对适应性挑战，勇气是领导者从表层管理走向深度变革的必要条件——没有勇气，领导者只能停留在事务处理，而无法促成组织能力的跃迁。

沃伦·本尼斯（Warren Bennis）为这些思想画上了人格与实践的连接：真正的领导需要在真实自我与外部压力之间保持一致，勇气因此成为一种长期的自我修炼。换言之，领导力的成熟不仅是技能与策略的积累，更是不断以价值为锚、在不确定中承受并行动的过程。

综合古今中外的观点，可得出对当代领导者的三项实践性启示：一、以价值为准绳，构建无法轻易被短期利益侵蚀的决

策底线；二、培养情境判断力，将“何为可畏”与“何为可为”作为行动前的思考维度；三、制度化承担脆弱：通过组织设计、心理安全与透明机制，使勇气不仅是个体品质，也是可复制的组织能力。正是在这三者的交汇处，勇气才能从哲学命题转化为企业在动荡时代中实现持续变革与创新的核心资源。

真正的勇气来源于内在修炼——通过自驱、自控、洞察、创造与坚毅五种能力的相互支撑，领导者才能在压力与复杂环境中稳健前行。我提出的五力领导力模型，以中国传统五行哲学为映照，将领导力具象化为五种内在力量。

火——自驱力。内心的梦想之火，点燃行动。它让领导者即便面对混沌及不确定环境，也能迈出第一步。巴菲特、埃隆·马斯克，乃至任正非、俞敏洪的成功，都源于这团熊熊烈火。

土——自控力。守住激情的边界，维持稳健。它让领导者在权力、财富和诱惑面前保持内心定力，自控自律，防止激情反噬自身。正如孟子所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金——洞察力。在自驱与自控之间形成判断力，看透表象，把握本质。洞察力让领导者在复杂信息中识别趋势、分辨优先级，并指导战略与决策。

水——创造力。在变化中保持流动与韧性，将洞察转化为实际成果。它让蓝图变为现实，把“不可能”逐步逼近“可能”，实现组织和个人的突破。

木——坚毅力。在压力与不确定中生长，守护成果不被动摇。坚毅力不是蛮干，而是使命感、价值观驱动下的持续行动，让领导者在风雨中依旧稳健向前。

这五种力量互为支撑、循环强化：梦

想驱动行动（火），行动受控而稳健（土），行动有方向（金），行动落地（水），行动成果得以守护（木）。勇敢领导力因此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长期修炼与实践淬炼后的稳健力量——软而强、静而定、心有定力，柔而不折。

自驱力：行动的第一性原理

自驱力并非普通激情，也不是外界刺激的短期激励，而是领导者在缺乏监督、缺乏多数人认同时，在直接领导不在时，仍坚持做自己笃定正确之事的能力。它考验的不是速度，而是方向；不是激情，而是判断；不是外部动力，而是内在信念。在数字化、AI 和高效工具普及的今天，这种内在方向感比任何“外挂式驱动力”都更为关键，它决定领导者能否长期走得远。

自驱力的核心源泉，是梦想。以色列前总理希蒙·佩雷斯曾说：“当你的梦想

小于你的成就，你就失败；当梦想大于你的成就，你才真正成功。”梦想并非浪漫幻想，而是浓厚兴趣、坚定价值观、好奇心与深度认知的执念，是穿透现实、指向未来的使命愿景。它让领导者在高度不确定时代，仍能忠于内心、保持独立判断，并在短期诱惑前坚持长期方向，形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结构。

在现实中，自驱力是勇气领导力的第一原则。没有梦想的人无法自驱，做事从众、不能自驱的人无法拥有真正的勇气。正如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所言，真正的企业家精神是在逆境中坚持愿景，并努力将其转化为可行、可持续的现实。

自驱力也是其他核心领导力的根基：有了自驱力，洞察、创造、自控和坚毅才有方向、有意义、有生命力。它让领导者在压力、复杂和不确定中稳住心性、看清方向、持续行动，成为组织得以前行的底

层驱动力。

乔布斯坚信人的一生应以改变世界为志业。他曾说：“只有那些足够疯狂到相信自己能够改变世界的人，才是真正改变世界的人。”正是这种对使命的执着、自我驱动与战略克制，促使他在2007年推出首部智能手机，从而开启了信息时代的新纪元。巴菲特对投资的热爱同样是他事业持久性的根基。几十年如一日地践行价值投资原则，使他为投资者创造了长期回报；与此同时，他也始终把品格置于首位：

“正直，勤奋，活力。如果不拥有第一品质正直，其余两个将毁灭你。”两位领导者的实践共同提醒我们：远大的愿景须由坚守的价值观与持续的执行力来支撑，二者缺一不可。

自控力：向内修炼的稳定器

自控力决定领导者能否走得远、走得

稳、走得正。在快速变化的 AI 商业环境中，诱惑无处不在：权力、财富、荣耀、成功的光环，以及科技提供的“加速器”，通常会放大人性贪婪弱点，让原本谨慎的人不知不觉滑向失控。过去十几年间，我们看到无数政界和商界的领导者落水，往往不是因为战略失误或资金短缺，而是无法管理和驾驭自己，顶不住权力财富带来的诱惑。许家印、贾跃亭等企业家的教训告诉我们，做事先做人，否则下场很惨。

自控力并非对外部环境的盲目管控，也不是对他人的约束，而是对内心欲望的治理：对利益、权力、金钱以及危机情绪的节制。成熟的领导者首先要分清何为可为，何为不可为，哪些边界不能逾越，哪些诱惑必须拒绝。稻盛和夫便是自控力的典型，他把“做人何为正确”作为每日反思的核心，强调从心开始的自我修炼：不是要消灭欲望，而是要在欲望膨胀时让其

止步，保持身心清醒，以免品格为短期利益所侵蚀。

古代文本对人性弱点的洞见至今仍然警示我们。《道德经》第十二章揭示了感官享乐如何使人失序：“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难得之货，令人行妨。”两千五百年过去，人性未变：色、声、味、欲与稀有物品仍然诱发越轨行为。因此圣人所倡导的不过是回归基本事务、节制感官欲望；当代领导者应把这种节制转化为持续的自我审视机制，而非一次性的道德劝诫。

在组织与企业层面，自控力同样是一项必须制度化和常态化的能力。缺乏自控的决策往往被短期收益驱动：以价格战换市场占有率、以临时激励撬动业绩，这些做法或许能赢得阶段性胜利，却会破坏生态、侵蚀信任并埋下长期风险。真正可持续的竞争力来源于在诱惑面前保持节制的

能力，即用长期价值观约束短期行动，用制度和激励设计守住组织的边界。

对于走向国际化的企业，自控力更是一种底层能力。出海并非简单复制产品和价格策略，而是输出能被当地市场接受并尊重的文化与品格。沉溺于迅速取利的策略，往往以牺牲合作伙伴生态、忽视当地规范与情感作为代价；而坚持双赢思维、长期价值创造的企业，才能真正取得客户与社会的信任，从而在全球竞争中站稳脚跟。

技术越发达，领导者越需要向古典智慧借力。AI 没有灵魂、没有思想、没有价值观，它可以提升效率，让企业更强大，却无法让人高尚，也无法帮助人抵御诱惑。正如老子所言：“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这提醒我们，真正的领导力首先是对内心的修炼，而非对外界的征服。

洞察力：在混乱中看清方向

自驱力带来梦想与行动，自控力带来克制与内在和谐，这看似悖论的两极，在洞察力中得以平衡。洞察力是一种透过表象看本质的能力，使领导者在纷繁信息中识别趋势、判断方向、取舍优先。它回答三个核心问题：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时候按兵不动，什么时候果断出手；什么必须坚持，什么必须放弃。乔布斯曾提到冥想带来的启发：“心静下来，方向自明。”

历史亦印证了洞察力的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欧洲大部分领导人未能看清希特勒的真实意图，许多国家采取绥靖政策，苏联的斯大林甚至与希特勒签订秘密条约出卖波兰。唯有英国首相丘吉尔具备洞察与勇气的结合：在1940年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他不气馁、不妥协，坚信法西斯必败，并呼吁英国人民全力抗击侵

略。他在演讲中誓言：“我们将战斗到底……绝不投降，即使这个岛屿或大部分领土被征服并陷于饥饿。”丘吉尔的洞察力使他看清了敌人的威胁，而他的勇气则让国家坚持到底，最终赢得胜利。

洞察力的核心在于内心的宁静。这种宁静不被外界喧嚣干扰，不受权力、财富或短期利益的牵引，使思维得以放松、敏锐而深刻。它让领导者从表象看到本质：从一个人的举止洞察真实心态，从项目表层判断潜在风险与机会，从纷乱信息和政策中识别长期趋势。在当今复杂且噪声密布的环境中，洞察力尤为关键，它使领导者不是被表象牵着走，而是看清事物的规律。

洞察力的对立面是纠结。许多领导者在复杂环境中感到焦虑，并非因为资源不足，而是因为试图抓住所有选项、不愿放弃任何方向。无法取舍的人难以心定，而

心不定就无法聚焦，也就无法深度思考，洞察力自然难以形成。因此，洞察力首先要求领导者看清自己的内心，再看清外部世界。

正如老子所言，混乱并非终点，而是新秩序萌生的契机；巴菲特也强调，在看似混乱的市场中，洞察力来自对周期、人性与规律的深刻理解，而非盲目逆势。战略洞察、人性洞察与哲学洞察最终汇聚为领导者的思想力——一种即便在不确定中仍能做出确定选择的能力。真正拥有洞察力的领导者，其使命、愿景与价值观不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内在指南，帮助他在杂音中辨明方向、在诱惑前稳住脚步、在危机中捕捉机会。洞察力使领导者从“看见世界”走向“看懂世界”，最终走向“创造世界”。

创造力：探索未知的可能

创造力不是偶发的灵光，而是“知行合一”的能力：将使命、愿景与价值观落实为可触的现实，把洞察转化为行动。以晨光集团在非洲的实践为例，他们从红辣椒生产切入，通过观察市场与土地，迅速调整策略种植小麦等作物，即便遭遇干旱等自然挑战，也能实现利润最大化。这是洞察力向创造力转化的经典案例。

创造力是产生新思想、新发现和创造新事物的能力，它源自知识、智力、能力与品格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优化。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认为，企业家的本质在于创新，其工作即是“创造性的破坏”，而这种创新的主动力量正来源于企业家精神。约翰·科特（John P. Kotter）也指出，变革型领导力的核心在于“引领组织跨越不确定性”。由此可见，创造力不仅是智力活动，更是一种面对未

知的勇气；而企业家精神则体现为承担风险、打破传统、突破路径依赖的勇气。正如尼采所言，勇气是一种对恐惧的直面与超越，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行动力。企业家正是这种创造力的原动力。

然而，创造力从来不会顺利而来。任何原创想法都要求创造者走出舒适区、挑战权威、颠覆旧有概念，并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坚持下去。这往往意味着要面对质疑、孤立甚至阻力。没有突破的勇气，创新者难以迈过最初的门槛，也难以把构想转化为现实成果。因此，创造力不仅依赖智识与资源，更深植于领导者的勇气之中：敢于面对未知、敢于承受压力、敢于坚持自己的想法。

坚毅力：持续突破的力量

坚毅力是勇气的最终体现：危机中不崩溃，挫折中不放弃，压力中不气馁，困

难中不躺平。本质上，坚毅力是“持续的勇气”。心理学家安吉拉·达克沃斯 (Angela Duckworth) 指出，真正让人成功的，不是智商、背景或天赋，而是一种可以培养的心理特质——坚毅力。它源于使命感——对所做之事值得一生投入的深刻确信。坚毅力是基于价值观基础上的一种品格特质，成为自驱力和创造力的内在推动力。创造力与坚毅力共同形成领导力的闭环：使命产生自驱力，自控力保持定力，洞察力提供方向，创造力落实行动，而坚毅力守护成果。创造力不是激情的短暂爆发，而是在自控力磨练、洞察力沉淀之上孕育出的深层力量。它将蓝图转化为可感知的未来，将“不可能”逐步逼近“可能”。无论是企业家、职业经理人，还是教师、医生、科学家，只要内心澄明，都能在各自领域实现突破。

然而，创造力越大，阻力越强。中国

古语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真正的考验不是能力不足，而是心灵的脆弱；不是战略失误，而是风雨来临时能否扛得住。领导者在自驱、自控、洞察与创造之后，必须拥有终极能力——坚毅力。它不是蛮干，而是在逆境中持续前行、不被击倒的生命力。研究显示，在复杂多变、充满诱惑的时代，坚毅力比智商、天赋甚至背景更能预测最终成功。坚毅力的根源不是蛮力，而是使命感——有了使命感，才有持续前行的力量；没有使命感的坚持，只是硬撑。

五力支撑的内在修炼

勇气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系统修炼而形成的内在力量。在中国企业实践中，这意味着从单纯的“敢想敢干”向自我反思与自我修炼转型，从关注硬件与规模向重视文化、价值与社会责任延伸。勇气不

是冲动，也不是表面姿态，而是长期磨炼与实践淬炼后的内在品质。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内圣外王”：内在稳固，外在自成秩序。缺乏内在支撑，再强势的领导者也可能“外强中干”。企业界比比皆是——高位者在关键时刻失去定力，往往不是因为能力不足，而是因为缺乏理念、价值观与精神涵养。这种内在“信仰”非常重要，它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力量，使领导者在诱惑和压力下仍能保持自我。

过去 20 年，中国企业领导者群体经历了深刻变化：从“敢想敢干”走向自我反思与自我修炼，从关注硬件与规模转向文化与软件建设，从单纯追逐财富转向探问人生价值，从经济逻辑拓展到社会后果。在 AI 崛起的时代，技术固然推动生产力与制度变革，但 AI 没有灵魂、没有人性，也无法提供判断是非的道德基础。真正的决定性因素仍是人，领导者必须首先成为完

整的人：既具备专业技能，又拥有精神力量、价值观与道德判断。

全球企业家，无论文化或产业如何不同，本质上经历的内在路径高度相似：经历磨难、自我反思、建立准则、形成洞察，再依靠坚毅跨越不确定性。这一过程与佛教“五戒”、基督教“十诫”等古老智慧异曲同工——违背自然、人性与社会规律，终将失败。因此，未来的勇敢领导力绝非靠天不怕地不怕的冲动，而是一种思想、价值和心性淬炼后的品格；不是靠瞬间胆识，而是基于使命、洞察和坚守之后的稳健之勇。

在国际化经营中，企业家的洞察力尤为关键。企业家必须明确战略目标，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并为团队制定清晰规则。一家中国新能源企业在北美布局时，通过本土化管理、培训当地人才、遵守法律法规、融合文化，实现了团队与市

场的良性互动。在中美关系紧张的大环境下，这种能力帮助企业赢得了当地客户的信任与认可，显示出成功的国际化依赖领导者的自控力、远见与长期经营理念，而非短期获利思维。

海外经营挑战无处不在：文化差异、政策变化、员工管理、地缘政治风险，都会影响企业发展。企业家和国际化领导者必须具备坚定意志与顽强毅力，这种能力建立在对市场充分理解、专业团队支撑和明确使命愿景之上，否则即使个人能力再强，也难以在全球舞台立足。

真正的领导力，是一条从内到外的修炼之路：自驱点燃行动，自控守住平衡，洞察看清方向，创造实现价值，坚毅跨越阻力。勇气领导力，是软而强、静而定、柔而不折的力量——源自自我修炼、价值根基与使命感，而非莽撞与冲动。它是五力协同下的内在支撑，让领导者在复杂与

不确定中稳住心性、把握方向、持续前行，最终成就可持续的卓越与价值。

勇气型领导者，是在不确定时代中既能看清现实，又能坚持正确方向，并在压力、失败与混乱中保持行动的人。没有自驱力，必然没有开始的勇气；没有自控力，不可能有坚持的勇气；没有洞察力，就缺乏判断是非的勇气；没有创造力，就没有突破的勇气；没有坚毅力，就丧失跨越逆境的勇气。

在今天的高度不确定性时代，真正的领导力从来不是权力、技巧或性格，而是一种内在的品格能力——勇气。勇气不是一时的激情，也不是天生的冲动，而是在恐惧、混乱、风险和压力面前仍能做出正确选择的道德力量。过去十年，中国社会经历了国内国际环境巨变带来的挑战。领导力研究显示，勇气并非简单的心理特质，而是由五项能力长期积累而成：行动的勇

气、约束的勇气、洞察的勇气、创新的勇气，以及面对复杂环境、承受压力的坚毅力。这五项能力共同构成领导者在复杂局势中的判断、决策、行动与坚持，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勇气型领导力”。

如果说 AI 技术和资源决定组织能走多快，那么勇气决定它能走多远。未来属于那些敢梦想、敢自省、敢突破、敢创新、敢坚持的领导者。世界愈复杂混沌，领导者愈需勇气；外部愈加不确定，内在的勇气愈显珍贵。勇气，正逐渐成为未来领袖最稀缺也最关键的战略资产。

侯宏⁸：AI时代企业家心力的三重修炼

中国人常说知行合一，脑力主思考策划，体力主行动。工业革命机器的应用，大量替代了人力和畜力。现在AI带来的是智业革命，人类具备的智力可能被AI替代。尽管技术进步呈现欣欣向荣的状态，但社会上也弥漫着恐慌情绪，人们禁不住疑惑：不用干活、不用动脑，人的存在价值究竟在哪里？

答案是心力。

在中国文化中，心的地位非常重要，甚至高于脑。我们会认为：脑子笨点、反应慢些不算致命的问题。如果心眼坏了、

8. 侯宏：北大国发院管理学助理教授、剑桥大学战略学博士。

品行不端，那真要命。《黄帝内经》中提到“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心力主智，智是连接现在和未来的矢量，能引领人向前走，也是我将要探讨的核心内容。

了解西南联大历史的人都知道，那是中国高校历史上的一段传奇。在国破家亡之际，在抗战时期恶劣的物质条件和高度不确定性下，仍有一群人坚持办教育，且短短几年就达到了中国教育史上至今可能仍未被超越的高峰。支撑他们的不是体力，也不是脑力，而是信念。我在参观完西南联大后回来撰写了一篇文章，大标题就是《体脑皆下品，唯心最动人》。

为什么唯心最动人，因为心有信念。物理学里有一个概念是“熵”，用来度量系统的无序程度。“熵增”揭示了一个基本规律，即所有事物在不受干预的自然状态下都会逐渐走向混乱、无序；“负熵”

则是对抗无序、维持系统整齐有序的力量，符合热力学第二定律。

对应到我们的生活中，有序的状态具有共性，就像杯子无论外观如何，本质都是能盛水的容器，具有确定性。无序的状态就像打碎的杯子，变成碎片，有无数种排布方式，不确定性极高，要从中找到有序的状态，尤其是形成杯子那种特别有序的状态非常困难。

具体到应用，不管是做优质企业、经营幸福家庭，还是保持身体健康，本质上都是在维持一个有序系统，需要的正是负“熵”的支撑。人类给这种“负熵”赋予独特意义，称之为信念。

从西南联大历史中我得到的核心启示，正是人的信念能够对抗“熵增”的自然趋势，维系系统的有序性，避免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这一启示同样适用于企业经营：

企业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同样面临“熵增”带来的混乱风险，企业家的心力所催生的信念，正是对抗这种风险、维系企业有序发展的核心“负熵”。

西南联大联席校长梅贻琦曾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管理过三家世界 500 强企业的宁高宁在《千亿密码：中国领军企业成长启示录》的前言中写道“在有形资产、大楼和工厂后面，肉眼不易看到的是组织、思想和精神。这些往往无形，却最具持久的力量”。我们能感受到二者均在强调内在思想、精神、信念即心的重要性。

我将其总结为这样一句话：心力催生信念，而信念可视为一种来自未来的信息——它不等于预测，而是一种面向深度不确定性的稀缺“负熵”之源，更是开创事业、实现基业长青不可或缺的力量。翻阅《千亿密码：中国领军企业成长启示录》

与《大道至朴：刘永行管理心得》两本新书，并将西南联大历史中彰显的精神力量延伸至企业经营领域，上述总结都可以得到印证。心力充沛实为企业家最独特的禀赋。

基于以上思考，我将心力拆解为初心、耐心和细心，三者共同构成企业家应对复杂挑战的核心能力。

初心——企业家精神与企业文化

这里所说的“初心”，并非“要成为世界首富”或“成为行业第一”之类的口号，而是指企业家无论身处何种赛道、哪个阶段，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信奉并践行的无形准则（例如价值观）。企业家精神体现了企业家处理外部关系的方式，而企业文化则反映其处理内部关系的方式，二者都是企业家初心的外显。企业家精神可从行为模式体现，比如一个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其行为举止能让人感知到背后的精神内核。

企业文化同样体现在行为模式中，走进一家公司，员工的行为举止、领导对待下属的方式，都是企业文化的体现。

两本新书中的案例多次印证这一点：初心为企业长期发展定下无形的准则，而在发展过程中既外显为企业家面对外部竞争的精神内核，也内化为企业内部的文化共识。

王传福在总结比亚迪成功核心时说：“有这些软的东西在，我相信超越国外汽车巨头只是时间问题。”

TCL 案例作者薄连明写道：“为什么有些企业昙花一现，有些企业基业长青？多年的管理实践让我确信，答案藏在‘企业家精神’这五个字里。”

商业战略专家周掌柜通过调研指出，Vivo 的“本分文化”已成为其一切战略、管理与竞争策略的第一性标尺。

《大道至朴》编著凌龙强调：凡企业皆有两套系统，一为看得见的物质系统，一为看不见的文化系统，而刘永行更看重后者。

或许有人会问：难道战略不是最重要的吗？战略固然重要，且多数战略决策依赖智力而非心力，但战略本身无法回答一个元问题：你要成为一家什么样的企业？

这是“在哪里竞争”（where to play）和“如何取胜”（how to win）两大战略问题的前提，却很难通过后天学习获得。例如，刘永行坚持东方希望不上市，而何享健力推美的上市透明化，二者选择的不同源于创始人初心的差异，而商学院难以给出标准答案。

初心关乎企业的持续成功，而不必然与短期成功相关。前述企业多为2000年甚至更早创立的制造业企业。相比之下，

更年轻的互联网企业如 TikTok、Shein，对企业文化的强调尚未上升到“第一性”的高度。它们的成功究竟源于自身特质，比如初心，还是行业红利，或许还需更长时间的检验。

耐心——最难的路就是最短的路

刘永行说，“战略确定之后，剩下的时间都是做战术。”这句话看似简单，实践中却极耗心力，尤其是耐心。战略落地往往无法一蹴而就，尤其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中，更需要企业家以耐心穿越周期、坚守路径。这份耐心有时候甚至让企业家注定孤独，且常不被外界理解。王传福曾坦言：“在别人看不清、不理解的时候，我们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要去向哪里。”2003年，比亚迪从电池制造商转向整车生产时，几乎无人看好，但他基于对自身核心能力的判断，坚定地踏上这

条路径，并最终转向电动车。

“最难的路就是最短的路”也是刘永行的原话。一方面，他借此告诫“不要自作聪明走捷径”；另一方面，“难走的路”迫使企业不断锤炼自身能力，这样的企业也自然能抓住未来的机会。我所强调的是敢于走难路的动因，他则指出了走难路带来的益处。二者结合，更能完整理解“耐心”的深层内涵。

李志刚在书中分析美团案例时提出：为什么美团能在多个业务中后来居上？答案在于耐心。耐心，又源于清晰的战略目标；清晰的战略目标，则来自可靠的模型与方法论。这里，耐心似乎又等同于信心：对未来越有信心，对当下就越有耐心。

问题在于：方法论真能为不确定的未来注入信心吗，尤其是面对完全未知的领域。这让我想起莱特兄弟发明飞机的年

代——当时欧美主流科学界普遍认为“飞机不可能被制造出来”，能够指导这项工作的核心“模型”尚未出现，可以说既无成熟的方法论，也无明确的数据支撑。

与其说是信心，不如说是信念。莱特兄弟在信念驱使下，通过科学试错收集了大量飞行相关数据，才逐步发现飞机飞行的关键因素。此前，科学家认为体重是决定飞机能否起飞的关键，因为观察到鹰吃饱后飞不起来，莱特兄弟通过大量研究发现，引擎、翅膀面积等才是关键。在莱特兄弟的故事里，信念最终通过一次次试飞转化为数据，有数据支撑的信心不断增强。

第一推动力，仍然是心力。莱特兄弟的故事并非个例，在企业经营中，这种信念先于数据的逻辑同样成立。2005年比亚迪F3的成功，正是王传福在转型初期缺乏明确数据支持时，凭借信念坚持后的成果。若没有最初的信念，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这也印证了管理学中的一个经典寓言：企业家成功后归因的关键要素，未必是真正的成功要素，但正是对这些要素的坚定，支撑他们走出了困境。

细心——组织、方法论与制度

具备了初心与耐心，进入漫长的战术执行阶段，企业家还需“细心”。编著凌龙在书中引用《道德经》的话说：“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我也经常钦佩那些既能进行天马行空战略思考，又能深入细节狠抓执行的企业家。

刘永行在新疆打造“六谷相连、相融相生”的超级产业互联生态，令我尤为振奋。这一模式与我的导师、剑桥大学石涌江教授常探讨的产业循环理念高度契合。物质、能量、信息在系统中实现平衡，本是学术界的理想模型，但在刘永行手中，它“上”可指导产业布局，“中”可优化工厂与运

输设计，“下”可落实到沙漠绿化修剪，实在令人叹服。

例如：通常从山区运输矿石至工厂成本极高，常规思路是用 AI 无人车降低运输成本，但这并非最优解。东方希望的化工挖矿项目中，利用矿在山上、工厂在平地的落差，设计了一条落差 600 米的皮带运输管道，使每吨矿石在运输过程中反而发电 0.52 度，不仅实现零成本运输，还能创造收益。再如，政府投资 80 亿的码头年吞吐量 1400 万吨，每吨收费 20 元仍巨额亏损，而东方希望利用岸线建设的码头，年吞吐量 3000 万吨，仅投资 2 亿元，发送成本每吨仅 1 元。

正是通过资源动能与势能转换、积累细节优势，强大的企业竞争力得以形成。甚至可以说，东方希望的经营优势，除了战略层面的稳健，更源于执行层面无数细节的积累。

这些细节涵盖组织、制度、流程等多个方面，而落实这些细节有两个关键：

第一，这些细节体系均与企业文化、行业特性紧密相连，并无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模板。东方希望、比亚迪、美团等企业的方法论和管理体系各具特色，与自身文化、创始人初心及行业特征相关。

第二，细心极其耗费企业家心力，不能简单复制标杆，而应批判性学习吸收，且这些体系的内核是企业家初心，企业家不能离场，不能将相关工作完全外包。

企业家能被 AI 替代吗？

企业家拥有初心、耐心、细心这三颗心，它们能否被替代？针对甚嚣尘上的 AI 替代论，我旗帜鲜明地认为：AI 可以提供智力，却难以替代心力。简言之，智力是针对已有明确答案的问题发起挑战，算力强者胜

出；心力是为尚未发生、因而没有数据，更没有现存答案的问题提前“赋予答案”。这种笃定不来自大脑，而来源于心——这是 AI 尚未攻克的领域。

首先，初心完全无法被 AI 替代。企业尚未成型、成事、成功之时，其精神与文化已烙印在企业家心中、植入组织基因。尽管并非所有初心都能导向好结果，但伟大的企业家一定都发自初心。初心能写入 AI 吗？我认为不能，因为有时连企业家自身也难以清晰表达初心，更遑论被机器学习捕捉。初心往往只在艰难抉择时刻显现，如同庄子的“天籁”，无法直接被听见，只能通过地籁、人籁等后天的孔窍间接感知。

其次，耐心具有阶段性和时间属性，其初期的第一推动力是源于初心的信念，并无数据支持。就像王传福 2023 年决定转型时，所有数据反馈都是负面的，若靠

数据决策必然会放弃，但信念支撑着他坚持下来，这一点 AI 完全无法替代。耐心的核心目的，正是把这种最初缺乏数据支撑的信念——它们就像“天籁”般难以量化，逐步转化为有依据的现实，使其如同“地籁”般清晰可感。随着进程推进，企业家通过信念驱动的试错不断收集数据，原本模糊的因果关系变得清晰，先验判断也慢慢转化为有数据支撑的结论，当业务轮廓渐显、数据日渐丰富时，AI 便可在收集数据、将信念转化为信心、制定经营计划等环节发挥工具作用。

最后，细心总算可以托付给 AI 了吧？这好比乐器与乐谱都已齐备，奖励函数也已设定，似乎可以交给 AI 通过强化学习寻找最优模式——它或许比人工更高效、更精准，比老司机更可靠。但恐怕，企业家仍不应完全放手。问题不在于 AI 是否可靠，而在于一旦失去对细节的把握，企业家也

可能失去迭代成长的机会，一旦企业家本人停止成长，企业很可能在下一个周期遭遇灾难。企业家的认知提升离不开细节的打磨迭代，是通过感知、反馈与自我映射振荡逐步形成的。

总之，在技术奔腾、算法至上的时代，企业的终极竞争力并非源于可被计算、优化或外包的脑力与体力，而恰恰是那颗无法被量化的“心”。初心赋予方向与意义，是组织的灵魂与引力中心；耐心提供穿越周期与迷雾的韧性，将信念照进现实；细心则构成坚实的执行地面，让宏图伟业得以一寸寸生长。这三者交织而成的心力，是企业家在不确定世界中创造确定性的根本力量，是将“未来信息”借由这种“负熵”转化为当下事业秩序的伟大艺术。

04.

承泽精选

编者按：

全球格局深刻变迁，既有发展范式与治理框架面临系统性挑战，时代呼唤新的分析框架与行动指南。本栏目精选两篇国发院教授的研究成果，聚焦全球发展与星球治理两大重要议题，彰显了我院学者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战略视野与主动作为的担当精神。

北大国发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黄益平教授直面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困境与传统发展范式的局限，通过梳理中国等东亚经济体的成功实践，提出构建“全球南方共识”的核心主张，为南方国家探



索适配本国国情的发展路径提供了新思路。

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北大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教授从星球尺度出发，领衔研发了“星球健康坐标系统”（PHAS）。该框架将人类健康、物种健康、环境健康与社会健康纳入统一评估体系，以AI大模型为驱动，为全球治理提供可量化、可模拟、可预警的“数字罗盘”，推动人类从被动应对危机转向主动守护星球健康。

两位老师勇于突破传统理论束缚，立足现实需求，提出新框架、新工具，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贡献了北大智慧与中国方案。

黄益平：“华盛顿共识”破产后，全球南方的发展路在何方？中国经验给出答案

刘国恩：迈向星球治理的“数字罗盘”



黄益平⁹：“华盛顿共识” 破产后，全球南方的发展 路在何方？中国经验给出 答案

30th
Anniversary
1994-2024

2025年7月17日，我与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以下简称南南学院）的几位同事抵达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市，与当地政商学各界展开交流与研讨。正好在同一天，坦桑尼亚总统萨米娅·苏卢胡·哈桑发布了《2050年愿景》（以下简称《愿景》），期望到2050年，坦桑尼亚的GDP（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美元，人均GDP达到7000美元，消除

9. 黄益平：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院长、南南学院院长、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极端贫困，并成为非洲十大经济体之一。2024年坦桑尼亚的人均GDP为1268美元，这意味着在未来四分之一世纪里，人均名义GDP的年均增长率要达到6.8%，如果加上约3%的人口增长率，GDP的平均增速需接近10%。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规划。因为坦桑尼亚在2025年10月要举行大选，不排除执政党在这个时间点发布《愿景》，部分是为了提振选情。《愿景》提出了一些战略支柱与产业政策，包括综合物流、能源革命、科技赋能、研发驱动、数字化转型，以及通过聚焦农业、旅游业、工业、建筑业、采矿业、蓝色经济、体育创意产业、金融服务、客户服务业等九大产业，实现就业创造与出口拉动的目标。但《愿景》并未提供具体的策略与路径，虽然政府表示将建立长期展望与五年计划双轨推进的方式。

如何成功推动经济发展、摆脱贫困、改善人民生活质量，是很多南方国家长期面对的难题。自二战结束以来的80年间，学界与政界都做了很多努力。“发展经济学”形成的大背景就是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诉求，国际组织也提出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2023年，联合国有193个成员国，其中36个是发达国家，157个是发展中国家。几十年来这个分组的变化不太大，说明无论是发展经济学学术理论还是“华盛顿共识”政策框架，在指导、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成效相对有限。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等成功的亚洲经济体的政策却常常因为“过大”“过多”的政府作用而受到批评。

作为一个成功实现经济起飞的南方国家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能为全球南方发展贡献什么？一方面，南方国家是否可以借鉴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政策？中国实

行渐进式、双轨制改革策略，虽然看起来不太彻底，但 40 多年的高速增长是客观事实，也许中国的做法对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具有启示意义。另一方面，中国能如何促进全球南方的合作与发展？在国际经济秩序出现动荡、新的技术革命扑面而来的当下，中国能否发挥创新推动者与稳定维护者的作用，对于全球南方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南方国家的发展困境

绝大多数南方国家与坦桑尼亚一样，渴望实现快速经济发展，但“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世界银行的两位经济学家英德米特·吉尔和霍米·哈拉斯在 2007 年的一份报告中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揭示了绝大部分南方国家无法成长为高收入经济的严酷事实（Gilletal., 2007）。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在 1960 年，

全世界有 101 个经济体处于中等收入区间。在近半个世纪之后，这 101 个经济体中有 13 个上升到高收入区间，剩下的 88 个经济体要么仍处中等收入区间，要么滑落到低收入区间。

导致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根源在于，随着经济发展，收入与成本水平同步提高，大多数南方国家无法持续提高经济竞争力，从而很难保持经济持续增长（Zhuang et al., 2012）。造成竞争力无法持续提高的因素可能很多，经常被提到的包括不平等矛盾突出、教育不普及、基础设施不发达、研发能力弱、营商环境差等等。如果简单地归结为一条，就是缺乏创新能力。随着成本水平不断提高，必须沿着产业梯子不断地往上攀升，从低技术、低附加值的产业过渡到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可惜的是，大部分南方国家跨不过这一步。比中等收入陷阱更糟糕的是所

谓的“贫困的恶性循环”和“低水平均衡陷阱”，这类问题在非洲大陆十分普遍。

为了促进南方国家发展，以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为主的位于华盛顿的一些国际组织提出了“华盛顿共识”，指导发展中国家的改革与发展实践，主要包括10个方面的内容（Williamson, 1989）：

1. 财政纪律；
2. 公共资源集中到基本医疗、基本教育和基础设施；
3. 旨在降低边际税率与扩大税基的税收改革；
4. 利率自由化；
5. 竞争性汇率；
6. 贸易自由化；

7. 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的自由化;
8. 产权私有化;
9. 旨在消除进入与退出障碍的放松管制;
10. 产权保护。

这一套符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念的政策框架，概括成一句话，就是走彻底的市场化道路，实行“小政府、大市场”的经济模式。国际组织，尤其是IMF，在世界各地推行这套政策理念，特别是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的时候提出“条件性”要求，即按照“华盛顿共识”的原则深化市场化改革。但真正因实行“华盛顿共识”而实现经济腾飞的国家并不多，有专家认为智利可能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与此同时，一些东亚经济体虽然因“背离”“华盛顿共识”的原则而受到批评，但其经济增长的成效却十分显著，日本、

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都已经跻身高收入经济，中国很快也将可以达到高收入经济的收入水平。

“华盛顿共识”和“东亚模式”之间的一个重要分歧点在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分工，在“华盛顿共识”的框架里，政府发挥的基本上是“守夜者”的功能，提供医疗、教育、基础设施及产权保护等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与定价的功能则全部交给市场。而“东亚模式”中最常受到批评的是政府干预过多，特别是这些国家实施的产业政策，即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旨在推动新兴产业的形成与发展的政策措施。制定与实施产业政策，主要是基于一个重要的假说，即存在市场失灵或外部性问题，比如企业投入创新活动可能会产生外部性，但回报却无法完全内部化，因此光靠市场机制很难有效激励企业从事创新活动。

客观地说，“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

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并不错，问题是如何落实。有两种现实情形值得深入探讨：

一是北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是经过很长时期的发展才形成的，在大多数南方国家，市场机制并非天生成熟、有效，具体可能体现为供需匹配困难、定价机制不灵敏、资源配置不顺畅等，这些问题无法通过“一放了之”来解决。杰弗里·萨克斯等学者曾经提出通过“休克疗法”，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快速过渡，这一策略在玻利维亚和波兰等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Lipton et al., 1990），但在苏联经济的转型中没有发挥有效的作用，俄罗斯似乎至今尚未建立起高效的市场经济，经济发展的表现也远不如实行其他改革策略的国家亮眼（Sachs, 2012）。可见，实施“休克疗法”需要必要的条件。

二是即便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市场失灵现象也普遍存在。市场失灵的典型例

子包括收入不平等、环境保护和创新驱动。最近美国政府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表面看似乎与特朗普总统个人偏好有关，深层看其实是不平等矛盾恶化所致。二战以后，美国倡导、推动经济全球化，令世界各国，包括亚洲经济体受益，但美国可能是最大的受益国。与此同时，也造成了一些结构性矛盾，如小镇蓝领青年的失业问题，这其实也是市场失灵的一个体现。现在特朗普政府采取产业政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试图吸引制造业与就业回流，说明美国自己已经抛弃了过去一直倡导的包括贸易自由化在内的“华盛顿共识”。另外，过去美国财政部和 IMF 的专家总是建议遭受危机冲击的国家实施财政紧缩、市场出清，以防范道德风险问题，提升经济质量。但后来在次债危机期间，美国当局却采取超常规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救助金融机构与企业。

总之，在过去 80 年间，绝大部分南方国家未能实现经济翻身。不成功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一些南方国家政治局势动荡、公共秩序混乱，自然无法有效组织经济活动。但即便没有这些问题的南方国家，也很少能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说明它们都还没有找到成功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路径。

中国经验与政策启示

有少数经济体成功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二战结束的时候，日本与亚洲四小龙都是低收入经济体，现在均已成为高收入经济体。日本在 1950—1973 年的 GDP 年均增速达到 10%，韩国在 1960—1980 年为 8.9%，这些表现都非常接近甚至超过了坦桑尼亚最近提出的增长目标。中国的表现同样耀眼，在 1978—2024 年的 GDP 年均增速为 8.9%。1978 年，中国

的人均 GDP 是 156 美元，到 2024 年提高到 13445 美元，已经非常接近高收入经济体的水平。也许东亚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经验可以为希望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南方国家提供一个替代政策方案？

如果把中国的现行政策框架与“华盛顿共识”做一个对比，可以发现中国的一些政策方向与“华盛顿共识”是一致的，如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放开、贸易自由化、放松管制、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及政府对医疗、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资等，但差异也非常明显，比如：

- 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
- 政府直接、间接参与经济活动，包括实行产业政策；
- 规模巨大的包括显性与或有的公共债务；
- 尚未完全放开的资本、土地、劳动等要素市场；等等。

上述差异既可能反映市场机制尚不成

熟的现实（所以要素市场还没有完全实现市场化），也可能反映了市场失灵是普遍现象（所以政府需要发挥积极的作用，比如产业政策）。而国有经济部门究竟保持多大规模合适，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政策策略的不同，可能也是学说不同的结果，虽然孰先孰后不一定好判定。2024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罗宾逊。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曾经合著畅销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他们提出，“制度影响实际生活中的行为与激励，从而决定一个国家的成功与失败”。更进一步，“尽管经济制度对于决定一个国家是贫困还是繁荣至关重要，政治与政治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拥有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包容式与榨取式制

度的概念。应该说，这一诺奖理论逻辑严谨、结论清晰。《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因而得到了许多著名学者的肯定，诺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教授就在其推荐词中推测，正如我们今天还在阅读两百多年前出版的《国富论》，“两个世纪以后，我们的重重孙们还将继续阅读《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本书”。

但这样一个理论对于南方国家的改革与发展政策到底有多少指导价值？从指方向的角度看，肯定是有意义的，建立好的制度是实现持续增长的根本保证。但问题是，有多少南方国家可以在相对比较短的时期内建立一套包容式的制度？上述几位学者曾经将包容式制度与榨取式制度的分野溯源到殖民时期宗主国的行为，甚至特定病毒如黑死病的死亡率，但这样的演变路径显然无法复制。也许南方国家可以朝着建设包容式制度的方向努力，但短期不

一定能对长期增长起到正面的作用。另外，究竟怎样的制度算包容式也并非一目了然。比如，二战刚刚结束时，菲律宾拥有的自由市场与民主政治更加接近包容式制度，而韩国的军事独裁体制则更接近榨取式制度。现在韩国早已成为高收入经济体，而菲律宾却仍然陷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国发院）/南南学院的学者们也各自根据中国的实践提出了关于改革与发展的学术思想与理论，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周其仁老师的《中国做对了什么》，林毅夫老师的《中国的奇迹》和《新结构经济学》，以及张维迎老师关于双轨制价格改革的论述等。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学者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有时候甚至是针锋相对的。国发院的文化传统就是“和而不同”，他们对中国政策的实然与应然分析有差异，其实很正常。如果尝试做一个综述，也许

可以将这些学者的一些不尽相同的观点归纳为从不同的视角阐述中国经济政策的三个方面：

一是明确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虽然在改革初期政府并没有明确指出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但政府在改革时期所做事情的指向非常清晰。周其仁老师在《中国做对了什么》里明确提出了改革政策所做的几件事情，包括界定产权、发挥企业家作用、重新发现看不见的手、挑战腐败，这些都是建设市场经济制度的必要步骤（周其仁，2010）。林毅夫老师合著的《中国的奇迹》聚焦发展战略与改革政策，但其核心故事是一致的，政府在改革时期采取比较优势导向的发展战略，基于比较优势配置资源，其实就是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林毅夫，等，2024）。

二是采取渐进式、双轨制改革策略。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际学术界曾经

发生过一场关于“休克疗法”与“渐进改革”的争论。张维迎老师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双轨制”的价格改革思路，通过先放开市场轨的价格，再逐步调整计划轨的价格，最后实现两轨合一，完成从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的过渡（张维迎，1984）。这个策略的长处是平稳过渡，“休克疗法”则很容易造成一段时期的市场混乱。

“双轨制”策略不只是应用于计划与市场价格的改革，同样适用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改革。我本人后来的一些研究发现“双轨制”改革方式还促成了不对称的市场化策略，即产品市场迅速放开、要素市场持续扭曲。这是因为为了维持国有企业运行，政府需要通过压低诸如资本、土地等要素的价格提供变相的补贴（黄益平，2012）。事实上，到今天为止，要素市场尚未完全放开，但这不只是简单地反映改革尚不彻底，“扭曲”本身就是渐进式改

革策略的一个过渡性安排。

三是协调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市场不是完美无缺的，适当的政府作用可能是有益的。中国在改革前期曾经有一个非常庞大的乡镇企业部门，当时尚未形成良好的市场环境，乡镇企业依托基层政府的保护与支持，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后来随着市场环境的改善，大部分乡镇企业通过改制变成民营企业（海闻，等，1997）。林毅夫老师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以要素禀赋结构为起点，分析经济系统内生性、扭曲内生性和运行内生性。强调要素禀赋结构（如劳动力、资本、资源等）决定产业结构和技术选择，不同发展阶段的禀赋结构差异导致发展路径不同（林毅夫，2018）。新结构经济学的政策主张是，发展中国家应基于自身禀赋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避免盲目追求高技术产业。有效市场要与有为政府结合，市场配置资源，

政府提供基础设施、制度保障，解决外部性问题，推动产业升级。

概括起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政策实践具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征，即务实。**务实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策目标清晰可达。在改革的前期，决策者并没有清晰地勾画出改革蓝图。现在被普遍认为是改革起点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完全没有使用市场经济的概念，只是提出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当时企业、地方和劳动者缺乏积极性，所以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是通过放权、实行责任制，调动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率。随着改革的推进，又逐步提出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1992年党的十四大才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策者在改革初期没有提出宏伟的改革目标，有可能是受到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的约束，确定在短期内可能达成

的政策目标，既可以减少一些争议和阻力，又有利于在改革的过程中逐步积聚支持性的社会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改革政策没有明确的大方向，主要是把大目标分解成阶段性的、可达成的目标。

第二，政策措施稳健可行。与“可达”的目标相关，政策也要“可行”，能够落得下去。关于这点，“休克疗法”与“双轨制改革”的对比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休克疗法”似乎提供了一个数学上的最优解，但“双轨制改革”可能是现实中的最优解，因为“休克疗法”并不能在一夜之间催生成熟的市场机制，反而容易造成经济的混乱甚至崩溃。双轨制改革却可以在保持稳定的同时逐步形成市场机制，这种转型方式会造成一定的效率损失，从理论上看好像也不是最佳方案，但经济有可能实现平稳、持续的增长。这也说明，务实的政策

制定往往不是简单地选择所谓的“最优解”，而是根据现实情况权衡各个方面的因素，选择利大于弊的策略。“稳健可行”的前提是从实际出发，满足可行性的条件，适合做什么就做什么。

第三，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务实的态度意味着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既不必迷信市场的功能，也无须恐惧政府的作用，市场与政府各有长短，关键是如何扬长避短，发挥合力，实现快速的经济的发展。在改革前期，市场与企业尚不发达，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甚至形成了所谓的“GDP 锦标赛”现象，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成熟，改革政策开始追求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样，企业在创新活动中很难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克服外部性问题，政府的产业政策可以帮助克服这个短板。由此可见，政府与市场的配合，是一个动

态的过程，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配合的方式、程度都会有所不同。大的原则是，市场能做好的尽量让市场做，市场有不足的，则想办法由政府弥补。

第四，结果导向的决策过程。渐进、双轨的改革策略意味着在过程中，很多选择并不是唯一的，带有很强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色彩。如何确保改革的方向与措施是正确的呢？答案是结果导向。比如，如果政策变化有利于效率提高和收入增长，那就继续往前走，如果不利，就先退回来，再寻找新的方向。当然，具体的结果也会发生变化。在改革前期，GDP 增长几乎是唯一被关注的目标。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虽然 GDP 增长仍然是十分重要的目标，但就业、分配、收入、消费、创新、环境等变得日益重要。

第五，改革政策的可持续性。渐进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改革一直在路上”，

如果说它的优势是容易满足可行性条件并且以结果为导向，那缺点则是容易在改革的过程中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团，甚至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阻力。务实的政策就需要包含能够让改革持续下去的机制，比如，如果改革政策能够让大部分人受益，这样就形成改革政策的同盟军，成为支持进一步改革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决策者的远见与果断也至关重要，因为任何改革政策都会涉及利益关系的调整，这样才能保证政策决策过程既不被少数利益集团挟持，又不会演变成民粹游戏。

作为在过去近半个世纪中全球最为成功的经济体，中国的政策实践对于南方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许多南方国家希望在未来几十年达成的经济目标，正是中国刚刚经历过的过程。这并不是说，南方国家可以照搬照抄中国的一些政策，因为，每个国家的国情是不同的。中国经济能够

取得成功，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制定适合实际情况的政策，并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而调整政策。中国政策实践中的务实精神可能是最值得南方国家学习、借鉴的。

探索“全球南方共识”

“华盛顿共识”可能已经成为过去时。一方面，“华盛顿共识”指导南方国家的改革与发展，成果不多。另一方面，包括美国在内的北方国家也已经放弃了这一共识的一些基本原则。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原理是完全错误的，只是表明它的现实指导意义有限。

在“华盛顿共识”之后，也出现过不同的替代概念，比如乔舒亚·库珀·拉莫在2004年提出的“北京共识”（Ramo, 2004）及蒂姆·贝斯利、艾琳·布切利、安德烈斯·贝拉斯科等牵头在2025年提出的“伦敦共识”（Besley et al.,

2025)。毫无疑问，最有影响力的当数以诺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为首的专家在2008年提出的“后华盛顿共识”(Stiglitz, 2008)。斯蒂格利茨认为，成功的发展战略不应只出自华盛顿，而更应该来自发展中国家；“一刀切”的策略注定不会成功；各个国家应该更多地以自己的判断，勇于尝试；相对平衡政府与市场的作用；GDP增长不应是唯一的衡量标准，同时也应关注分配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性。这些主张切中了“华盛顿共识”的要害，可惜的是，这些理念迄今尚未在南方国家形成实质性的正面影响。

中国等东亚经济体提供了南方国家快速实现经济起飞的成功案例，这些经验对于广大的南方国家具有更大的借鉴意义。仔细观察中国的政策实践，有两个方面的特点值得深入分析：一是从实际出发，制定适合国情的经济政策，不盲目追求理论

最优；二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虽然两者之间的分工可能因时、因地、因事进行调整。这两条意味着，决策的主动权掌握在本国人的手上，而不是由外部强加，更不是接受“一刀切”的方案。因此，政策决策既需要科学，更是一门社会艺术。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什么作用？这是一个世纪话题。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开始，经济学一向都重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配合。早在1848年，约翰·穆勒就提出，市场决定生产什么和怎么生产，政府则利用税收与转移支付解决市场失灵与分配问题（Mill, 1848）。历史学家雅各布·索尔认为，经济学中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其实是近期才出现的现象，可能跟米尔顿·弗里德曼倡导的学术思想有关（Soll, 2022）。同期，尤金·法马提出了金融领域的有效市场假说。当时的大背景是二战以后，世界经济在美国的引领下逐步走向

开放与融合，推动了全球范围的效率提升与经济繁荣。但越来越突出的不平等问题最终导致美国的经济政策出现了反转，尤其是在2017年特朗普第一次就任美国总统以后。效率与公平之间如何平衡，是经济学的世纪难题。美国的经历表明，即便是有效的市场，也无法很好地平衡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

在南方国家，政府与市场结合可能更有必要，因为在大多数南方国家尚未形成成熟、有效的市场。至于政府具体应该做什么，最好是采取“务实”的态度。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分工应该保持灵活、开放，重要的是看结果，看是否有利于实现稳健、快速、可持续的发展。比如在一些南方国家，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却没有形成任何劳动密集型产业。那就需要追问其背后的原因：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税收负担过重？营商环境不佳？劳动雇用成本过高？或其

他？如果确定了瓶颈因素，政府就可以有针对性地缓解这些约束条件。

基于这样的考虑，也许有必要就什么是适合南方国家经济发展的政策框架展开广泛的探讨，充分吸取在过去几十年取得经济成功的南方国家的经验教训，进而形成“全球南方共识”。讨论这个共识的目的，并不是要替代之前的共识，更不是要提出一揽子的政策措施，而是探索适合应用于南方国家经济政策决策的一些基本原则。具体的内容，需要关注全球南方发展的专家学者共同讨论、推究，但下面几个方向可以作为讨论的起点与基础：

一是追求由市场决定要素和产品的配置与定价。在很多南方国家，更好地完善市场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是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发展的必要步骤。

二是政府采取务实的改革政策，完善市场体系。但建立、完善机制与制度，“一放了之”不见得能达成目的，而需要制定、实施符合国情、满足可行性条件的措施，持续推进。

三是政府与市场结合，克服市场失灵。除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政府还需要弥补市场不足。但克服市场失灵，不能演变成替代市场功能。比如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目的是解决外部性问题，支持企业创新、产业升级，因此，产业政策不应破坏妨碍竞争，更不应该由政府“选择胜出者”，还要预先设定明确的退出机制。

四是增长至关重要，但就业、平等、环保、稳定与安全同样很关键。对于南方国家来说，经济增长是首要目标。经验也表明，实现增长是减少贫困的最有效手段。与此同时，经济韧性也很重要，这样经济增长才能长期持续，也才能更好地达成满

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不断增长的需要的目的。

五是稳健开放贸易与投资，加强南南合作。成功的东亚经济体的经验表明，参与国际劳动分工是南方国家实现快速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但开放也可能会带来一定的风险，所以需要采取稳健的策略。现在一些北方国家的对外经贸政策出现了逆转，南方国家如何坚持开放的方向，但又不致遭遇严重的外部冲击，是一个新的课题。南方国家如何促进全球经济体系的开放以及相互之间如何加强合作，这些话题都值得深入探讨。

上述五条只是我个人的一些非常不成熟的看法。推动“全球南方共识”的形成，需要与南方国家的各界展开广泛的研讨。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对经济政策的立场也不一样。但借鉴一些成功的南方国家的经验，提出一些适合南方国家国情的基本

共识，从而指导南方国家的改革与发展政策，于全球南方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日益增大的今天，将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对于像坦桑尼亚这样力图振兴经济的南方国家，“全球南方共识”可以提供有益的政策原则与框架。

如果能够达成“全球南方共识”，也不宜由像 IMF 这样的国际组织去推行。因为这样的共识内生于南方国家，像“金砖国家”（BRICS）这样的全球南方组织可以广泛地就共识的内容展开讨论，甚至搭建交流与讨论的平台，但具体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的主导权一定要留给南方国家。“全球南方共识”是根据一部分南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大多数南方国家的实际情况形成的，其最重要的特点是务实，这意味着经济政策既要遵循一些共同的原则，实际工作中也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同时还要与时俱进。

刘国恩¹⁰：迈向星球治理的 “数字罗盘”

人类正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关口。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经济增长使人类大规模摆脱了延续数千年的“贫困陷阱”，人均生活水平提升数十倍，人口规模空前扩张。然而，化石燃料驱动的增长模式也带来了日益沉重的资源环境代价——目前全球每年排放约400亿吨当量二氧化碳，其中86%源于化石燃料利用和畜牧业。更值得警惕的是，气候变化每年已导致约500万人死亡；比尔·盖茨科学家团队预测，若不能有效遏制快速升温，到2100年，全球因传染性疾病的致死人数将达1000

10. 刘国恩：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北大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教育部经济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

万。在不健康的星球上，不可能存在健康的文明。正是基于这一判断，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机构，共同研发了“星球健康坐标系”（Planetary Health Axis System -- PHAS）。这是一次对人类健康认知方式的深刻革新，旨在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支撑，为观测人类活动与地球健康关系提供科学的“数字罗盘”。

一、重新定义“星球健康”

从人类发展足迹的回顾可见，超过99%的时间里，人类都处于极度贫困状态，人口增长缓慢，生活水平无法突破基本生存局限——即所谓马尔萨斯“贫困陷阱”。工业文明带来的现代增长使人类摆脱了这一困境，却也伴随递增的环境代价。正是这一历史进程，促使我们启动 PHAS 工程计划，追踪和评估人类发展、物种演进、

环境变化与广义星球边界关系的全景式进程，为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治理框架。

PHAS 的核心价值，在于推动人类从被动“治疗”环境转向主动“预防”风险，从个体孤立转向系统协同。大家或许见过月球上拍摄的地球照片，但如果从火星拍摄，科学家若不标注，我们根本无法识别——地球小得犹如尘埃。面对茫茫宇宙，人类显得如此弱小，保护星球健康没有回头路。PHAS 通过可量化、可验证的方式，帮助我们理解人类健康在更广义层面的生存逻辑，进而赋能全民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通过提示预防疾病、提高生产力、驱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为现代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导航”。

那么，PHAS 究竟如何定义和度量“星球健康”？它构建了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相互关联的“宏观数字孪生”模型，其核

心架构建立在四大相互依存的坐标轴上。

第一是人类健康轴。它超越了传统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统计，采用更全面的测量框架，不仅追踪全因死亡率、传染病及慢性病负担，更将生命质量、健康行为（如饮食、运动）与健康教育等要素纳入体系，切实度量每一单位生命年的健康水平。

第二是物种健康轴。这是 PHAS 范式创新的关键，它将非人类物种的健康状况正式纳入全球健康治理视野。通过整合生物多样性数据、构建人畜共患病预测模型（如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气候变量预测禽流感、埃博拉的溢出风险），并追踪农作物与环境微生物的健康状态，直指生态系统稳定的根源。

第三是环境健康轴。此轴量化了自然环境的压力与变化，是连接人类活动与健康结局的桥梁。它精细测算气候变化与极

端气候异常，全面监测空气、水体和土壤的污染水平（包括PM2.5、塑料微粒、重金属等），并动态计算各国的碳足迹、水足迹等生态足迹指标。

第四是社会健康轴。此轴度量人类的社会性行为对星球健康系统的影响。它涵盖经济发展（生产总值、资源消耗）、技术进步（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产业能耗），并尝试度量政府治理效能、社会信任度等“软指标”对公共卫生应急效果的影响，同时也将地缘冲突的风险与损失纳入监测范围。

这四大坐标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一个由人工智能驱动的“系统集成引擎”进行动态耦合，首次实现了对人类健康、物种健康、环境健康与社会健康全景式进程的实时追踪与智能评估。

当代前沿技术——人工智能、无人驾

驶、基因工程、生物科技、量子计算——正在深刻影响世界格局。如何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同时更好保护星球，是中国科学家和企业家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PHAS 的研究从经济增长角度切入，正是为了寻求这一平衡。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开发的增长模式，往往伴随生态环境破坏；主要依靠大规模资本投入的模式，其可持续性随时间推移面临挑战；以出口为单一动力的模式，则易受国际市场波动冲击。如果各国都沿袭当前以增长速度提升为中心目标的发展路径，地球无法支撑永恒发展——一味追求速度，必然导致产品过剩、供求失衡，最终走向自我终结。改变这一结局，需要约束过度的生产和消费行为。PHAS 为重塑星球健康管理范式提供了科学基础，使我们能够清晰了解地球动态，从而促进现代

经济向可持续方向转型。

二、从数据智能到治理智慧

PHAS 的设计基于三个基本观察。第一，工业革命促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贫困逃离，但也导致贫富阶层收入大分流。第二，现代增长依赖化石燃料密集使用，将星球边界不断推向临界点，危及人类安全运行空间。第三，现代经济学对未来资产折现的原则，对当代人似乎合理，却可能导致代际不公，损害子孙后代可持续发展权益。由 AI 驱动的 PHAS，通过动态寻找平衡的混合模型，实现范式变革，更好地度量人类活动与星球边界的距离，为全球治理与文明互鉴提供全新科学工具。

这种范式变革具体体现在 PHAS 的三大技术突破上。

首先是**面向文明永续的范式突破**，革除了由于“贴现求和”带来的代际歧视。

传统经济学决策往往依赖折现体系，容易诱导忽视远期价值的短视决策。PHAS 则采用了基于遍历理论的长时间社会平均总福利作为优化目标，避免了折现体系的根本缺陷，使系统得以综合考虑各代际的长期总福利表现，为制定跨越百年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了科学基准。

其次是**人工智能驱动的知识发现与校准机制**。PHAS 的核心引擎是一个持续学习的人工智能系统。一方面，它应用图上因果推断、非对称维度扩增等算法，能够发现变量间非线性的、长通路的关联，例如识别某种特定的气候变化模式与疟疾传播范围扩大的超前关联。另一方面，为避免 AI “幻觉”，PHAS 建立了“专家反馈校准机制”。AI 的分析结果会定期输出给全球不同领域的科学家进行验证和修正，这些专家意见又反过来用于训练和优化 AI 模型，实现了机器智能与人类智慧的完美

结合。

最后是**沉浸式的可视化与交互体验**。PHAS 不仅是一个数据分析工具，更是一个动态、可交互的全球健康“数字沙盘”。用户可以通过多维统计图表直观查看全球健康指标的“压力分布图”，进行多指标复杂通路分析，甚至可以调整政策参数，交互式地模拟和预测星球健康在未来数十年的变化路径，使抽象的挑战变得可感知、可操作。

对于企业家而言，PHAS 的价值不仅在于揭示商机，更在于明确责任。我无法针对具体行业讨论商机，但可以明确的是：通过 PHAS 数据，人类能够看清自身所处状态，识别可以从哪些方面修复、保护地球。我们有责任利用数据智能推动智慧治理。

具体而言，企业家和决策者可通过四个层面参与其中。第一，运用 PHAS 模型

对经济增长涉及的多个维度进行动态追踪和评估，不仅关注增长本身，还综合考量其对人类健康、物种健康、环境健康和社会健康的影响，全面衡量增长的可持续性。第二，利用模型的风险评估与预警功能，及时发现增长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第三，基于模型分析结果制定更加科学、全面的经济政策——例如，在产业政策中优先发展绿色产业、低碳产业和对人类健康有益的产业，在财政货币政策中引导资源向可持续发展领域倾斜。第四，通过对资源配置状态的分析，发现不合理之处，如过度投资高污染、高能耗产业，而对环境保护、科技创新和民生改善投入不足，据此调整资源配置方向，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PHAS 还是一个全球性分析框架，为各国提供共同参考标准和交流平台。各国可在此平台上分享经验、技术和最佳实践，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目前，盖茨基金会已参与系统研发，我们期待更多企业加入，共同推进平台发展。

在洞察未来产业趋势方面，PHAS 能够提供全新视野和决策框架。它在“同一健康”理念基础上，创造性构建了动态追踪人类发展、物种演进、环境变迁与星球边界关系的“数字罗盘”。这一系统不仅能再现已知科学规律，更能识别以往未被发现的“双向异性”关联路径，从而在认知层面实现从“局部分析”到“系统洞察”的跃升。通过 AI 技术挖掘“学科耦合器”潜力，PHAS 将经济学、环境科学、系统科学等多学科知识结构通过高维建模与动态网络有机整合，已展现出前瞻性与实用性。例如，系统模拟显示：若全球化石燃料使用减少 20%，仅能延缓星球健康水平下滑趋势，而无法扭转；但若将全球创新投入提升 20% 以上，则可能使星球健康水平逐步

恢复至 2000 年之前的状态。这一发现为全球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关键参考——仅靠减排不足以实现系统修复，必须依靠科技与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

三、为全球治理提供创新工具

PHAS 发布以来，已引起国际科学界与政策界高度关注。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这是一次开创性技术整合。

PHAS 首次将人类健康、物种健康、环境健康、社会健康四大维度纳入统一评估框架，集成超过 48000 项关键变量，通过 AI 大模型实现全景式星球健康监测，填补了系统性量化评估的空白。

第二，它直指全球治理的痛点。

PHAS 系统直面人类发展与生态可持续性的根本矛盾——如气候危机、代际公平等，

通过可视化“数字罗盘”为政策制定提供动态模拟与风险预警。随着更多数据、算法与应用场景的融入，PHAS有望成为真正的“全球公共品”，帮助人类在不确定世界中更清晰地看见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第三，这是跨学科国际协作的典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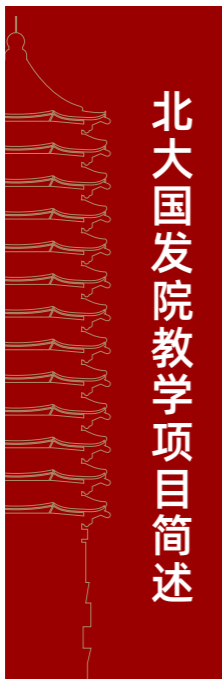
PHAS联合哈佛大学、剑桥大学、世界卫生组织、波茨坦气候变化研究所等数十家国际顶尖高校及研究机构，推动科学界与政策界深度对话。

第四，它体现了中国智慧的全球贡献。

PHAS将复杂系统科学与行为经济学结合，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创新工具，彰显中国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科技领导力。【补充内容开始：中国方案的全球价值】其成功不仅依赖于技术先进性，更需全球协作机制与包容性治理的支撑。北京大学的科研实践表明，以高校为载体的这种创新能够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科学支

撑和解决方案，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的重要体现。【补充内容结束】

对于 PHAS 的未来，我抱有深切期待。在全球首个聚焦行星尺度的健康追踪 AI 大模型的意义，PHAS 旨在让 AI 不仅为人类短期利益服务，更为星球长期安全思考。它不只是一个技术系统，更是一种文明层面的探索——提醒我们：个体的健康与人类整体的健康、与自然生态的健康息息相关。PHAS 标志着人类从“被动应对危机”转向“主动守护星球健康”的范式变革。当健康成为各国的共同语言，星球健康便是人类动听的合唱。在这场人类大合唱中，PHAS 可以发挥校准音准的关键作用。



北大国发院教学项目简述

国发院拥有政、商、学三大教学体系，旨在培养有专业、有视野、有格局的领军人才，服务国家发展，推动社会进步。

在学术教育方面，国发院的博士项目全国领先，毕业生已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生力军；经济学双学位（现经济学双专业）项目经过二十多年锤炼，已成为北大

的重要名片。从2017年秋季起，国发院从北大本科一、二年级学生里招收经济学专业（国家发展方向）本科生，贯彻以经济学为基础的博雅教育模式，培养具有跨学科视角的经济学博雅人才。

在商学教育方面，国发院BiMBA商学院创始于1998年，MBA、EMBA以学术导向和教学严谨闻名，学员评价长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DPS金融管理联合培养项目、EDP和承泽企业家研修项目亦获赞誉。

在政府行政和经济管理教育方面，国发院承办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自2016年起开设国家发展专业方向博士和公共管理硕士（MPA）项目，专门培养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公共部门中高层管理人员。

国发院同时还承担女性领导力、县域经济发展、县域领导研修班、CHO100、《财经》杂志奖学金与法律经济学奖学金记者班、乡村振兴公益培训项目等多项公益教学任务。



经济学本科生（国家发展方向）

学制：4年

规模：每年30人

招生：通过转系方式在北京大学一、二年级本科生中招生

项目特色

以经济学为基础的博雅教育，坚持专业化与多元化并举，采用国际化、跨学科、学术导向的培养模式，致力于培养拥有良好人文和社会科学素养、科学精神和批判思维的博雅型人才。

本科经济学双专业（北大校内）

学制：2-3年

规模：每年450人

招生：北大一、二年级本科生

项目特色

以严谨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和国发院强大的师资队伍为基础，为北大非经济类、非工商管理类专业的本科学生提供经济学普及教育，培养他们的经济学思维方式，为他们今后的发展提供新的助力和可能性。



经济学辅修项目（北大校外、北京市内）

学制：2-3年

规模：每年280人

招生：在京公办普通高校在读本科生/研究生和毕业五年内本科毕业生通过考试选拔入学。北大校友、北大在读研究生/第二学位学生免试入学。（皆为全日制项目学生）

项目特色

依托强大的国发院师资力量，为在京学生提供高水平经济学教育，培养具有坚实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基础，拥有跨学科背景的复合型高素质人才。



博士研究生（理论经济学、金融学、管理学）

学制：5年/4年

规模：每年25人

招生：本科直博士生、“申请-考核制”普博生

项目特色

学生和老师双向选择确定导师；比肩国际领先院校的专业课程体系和研究能力训练；有深度的国际交流；以问题为导向的学术训练；培养既深刻理解中国、又高度国际化的学术研究人才。



BiMBA商学院

智库中的商学院

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1998年开设国务院批准的北京第一家中外合作学位教育项目，原名北大国际MBA（BiMBA），2000年开设EMBA项目及EDP（企业定制培训项目），2015年以来陆续开设DPS金融管理联合培养项目、承泽企业家研修项目等。学院拥有朗润园和承泽园两个清代皇家园林院区及现代化教学楼。

秉承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风，以及国发院学术与现实高度结合、推动中国进步的情怀，BiMBA商学院竭力提升学生的专业管理能力和综合素养，通过赋能学生与校友的持续成长，推动企业、产业和社会进步。北大国发院是国家首批二十五家高端智

库之一，BiMBA商学院因此格外擅长培养学生“站在宏观看微观，把握大势调管理”的能力，被誉为“智库中的商学院”。

BiMBA商学院不仅优享国发院名师，还与比利时弗拉瑞克商学院（Vlerick Business School）、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简称UCL）、美国福坦莫大学（Fordham University）、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等强强联合，以中西合璧、国际一流的师资和知行合一的课程与教学，培养有专业、有视野、有格局的企业家和工商管理人才。

二十多年来，BiMBA商学院一直是中国EMBA项目和国际MBA项目的典范，也是DPS金融管理联合培养项目、EDP（企业定制培训）、承泽企业家研修项目和公益教学的品质担当与价值引领者。其中，MBA和EMBA项目在《福布斯》（中文版）《财富》《商业周刊》《世界经理人》、QS等

中国大陆与世界商学院排名中屡获殊荣，为中国商学教育赢得了广泛尊重。

工商管理硕士（MBA）

招生规模：200人（含国际学生）

招生方式：面向全球独立招生，申请-审核制

培养目标：培养既能领悟中国发展趋势，又深谙国际管理规范，同时富有北大精神和时代担当的企业家和高级管理人才。

项目特色

品 牌：_____

北京大学+英国名校UCL/欧洲名校Vlerick商学院。UCL多次在QS全球大学排名前十，Vlerick商学院是FT全球百强商学院之一，拥有EQUIS、AACSB和AMBA三大国际认证。

师 资:_____

北大国发院教授+英、美、欧商学院名师

课 程:_____

课程体系的理念为中西合璧、知行合一；智库高度、全球规范；管理经典、本土创新

职业发展:_____

全球商学院独有“MBA一对一职业导师”计划

声 誉:_____

QS亚太地区顶尖20所商学院学术研究水平中国大陆第一；全日制MBA、在职MBA连续多年名列《福布斯》中文版最具投资价值MBA项目第一；曾连续荣获《财富》杂志中文版“最具市场价值的商学院”；曾被《彭博商业周刊》誉为“一所有灵魂的商学院”



北大-UCL全日制MBA

学 制：16个月

语 言：英文

校 园：北京大学+UCL（英国伦敦选修课）

学历学位：双证：UCL MBA学位证书+教育部国外学历学位认证；北京大学修业证明

北大-UCL在职MBA

学 制：28个月

语 言：英文

校 园：北京大学+UCL（英国伦敦选修课）

学历学位：双证：UCL MBA学位证书+教育部国外学历学位认证；北京大学修业证明

30th
Anniversary
1994-2024

北大-弗拉瑞克商学院在职MBA

学 制：24个月

语 言：英文、中文

校 园：北京大学+Vlerick商学院（比利时选修课）

学历学位：双证：Vlerick商学院MBA学位证书+教育部国外学历学位认证；北京大学修业证明

30th
Anniversary
1994-2024

高级工商管理硕士-EMBA

学 制：2年

语 言：中文

学历学位：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历证书、硕士学位证书

招生规模：每年中国大陆100人，港澳台+外籍不限

招生范围：全球直招

培养目标

培养道德良好、遵纪守法、具有较强开拓创新能力和领导能力，掌握系统的现代管理知识和国际经济、技术发展的最新动态，适应国际竞争需要，具有国际经营战略头脑和总揽全局决策能力的企业家和高级职业经理人。

项目特色

以经济学与管理学为翼，尽享国家高端智库的独到优势，提升对国家发展趋势与商业环境变迁的洞察力，同时以20多年不断优化EMBA课程体系，通过内省、远见、创新、团队、行动五大模块构筑宏观视野、提升系统管理水平和领导力，培养真正“有专业、有视野、有格局”的企业家和高管，以领军者的成长推动社会进步。



企业培训项目（EDP）

BiMBA商学院的企业管理培训（EDP）专注于为企业、金融机构、公共管理机构等各类组织提供“定制培训”服务。20多年来，BiMBA商学院EDP项目一直被公认为“定制培训”课程的领军者。中西合璧的师资与理念，知行合一的教学与实战，北大人文的熏陶与修炼，深得宝马、奔驰、英特尔、卡特彼勒、辉瑞、诺华、拜耳、赛诺菲、诺和诺德、默克、德勤、毕马威、太古等跨国巨头，以及中国金融领军企业的好评。

DPS金融管理联合培养项目

DPS金融管理联合培养项目通过中西合璧的师资和知行合一的课程，以及论文写作，帮助学生反思和提炼多年管理经验，将实践经验与科学研究方法相结合，并上升为具有理论应用高度的博士论文。项目兼具北京大学的人文底蕴+北大国发院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传统，叠加美国福坦莫大学地处纽约

和多年积淀的金融优势，学员通过基础课程模块、专业课程模块、特色选修课程模块和海外游学课程模块的组合学习，加深人文底蕴，夯实理论基础，磨练学术思维，打开国际视野，切实提升理论水平和应用水平。

项目特色

北京大学的人文底蕴+北大国发院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传统+美国福坦莫大学地处纽约和多年积淀的金融优势，以中西合璧的师资和知行合一的课程，通过基础课程模块、专业课程模块、特色选修课程模块和海外游学课程模块的系统学习，加深人文底蕴，夯实理论基础，磨练学术思维，打开国际视野，切实提升理论水平和应用水平。



高管教育项目 (EE)

高管教育项目 (EE) 是以北大国发院 BiMBA 商学院工商管理教育为依托，整合国内外经济学界、管理学界优秀师资及卓越的业界领军导师，为企业家和高管开设的高级工商管理学习项目。项目坚持学术从严的国发院治学准则，发挥学制灵活的项目特色，以精品化的课程设计和人性化的教学管理，因应企业出海、技术进步和数字化时代业务增长等时代议题，帮助企业家和高管提升战略高度、领导力和经营管理能力，成为具有北大精神和全球视野的商业领军者。

北大承泽企业家研修项目

北京大学承泽企业家研修项目以与时俱进的创新课程设计，实现从理论到实战双向打通，培养企业家在新变局时代急需的新思维、新能力，帮助企业家在经济调整期重新锚定企业发展新方向，放眼更加广阔的海内外

市场，在中国企业出海的大潮中，因势而动，谋篇布局，找到市场破局新思路。项目学制1学年，非全日制。



北大企业家AI启航项目

北京大学企业家AI启航项目，定位助力企业家抢占AI时代战略制高点，提供从认知升维到执行落地的系统性全链路AI破局方案。通过建立AI共创生态圈，帮助企业决策者和高层管理者深度解构AI企业前沿模型，紧密追踪全球AI技术突破，基于标杆案例构建战略思维，打通技术研发、商业验证与资本运作全价值链。项目学制6-7个月，非全日制。



北大首席营销官（CMO）项目

营销驱动业务增长-北京大学首席营销官（CMO）项目，旨在通过市场与营销理念的基本建构、经典范式的优化和实用工具的赋能，帮助企业构建科学的、与时俱进的营销基本功与创新应用能力，护航企业稳定增长。项目学制3个月，非全日制。



北京大学企业家出海研修项目

北京大学企业家出海研修项目，是北大国发院依托国家高端智库优势与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全球网络，面向中国企业家打造的国际化战略赋能项目。项目整合国发院顶尖学术与政策研究资源，提供宏观趋势、全球治理、产业合规与跨境运营等系统课程，助力企业把

握全球化新格局。依托南南平台独特的全球南方资源与合作渠道，为企业搭建项目对接、市场落地、文化融合的高效桥梁。项目以智库洞察为引领、以全球网络为支撑，培养兼具全球视野与本土执行力的新时代出海领军者，推动中国企业高质量、可持续走向世界。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版权

制作单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制作部门：北大国发院传播中心

编选委员会

黄益平：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院长、南南学院院长、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黄卓：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国发院BiMBA商学院院长、南南学院副院长、
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王贤青：北大国发院传播中心主任

白尧：北大国发院传播中心内容主管

顾问委员会（按姓氏拼音）

高岚（联想集团人力资源高级副总裁、北大国发院CHO100理事）

何刚（《财经》杂志主编、《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主编）

刘二海（愉悦资本创始及执行合伙人、北大国发院EMBA校友）

刘娟（新华网副总编辑）

刘军（前美菜网CHO，北大国发院CHO100理事长）

吕守升（高潜咨询公司董事长、北大国发院CHO100理事）

马洪涛（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主持人、北大国发院EMBA校友）

乔顺昌（茂天（北京）投资公司总裁、北大国发院EMBA校友）

唐建伟（交通银行发展研究部副总经理、首席研究员、《新金融》期刊主编）

王海明（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长、北大国发院双学位校友）

文钊（经济观察报执行总编辑）

乌兰图雅（玲珑格致国际公关咨询CEO、北大国发院MBA校友）

武雪松（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北大国发院EMBA校友）

许芳（深圳市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理事长、北大国发院CHO100联席理事长）

余兰（20年知名互联网公司营销高管、AI应用创业阶段、北大国发院EMBA校友）

张继伟（财新网总编辑、北大国发院EMBA校友）

赵雪源（北大国发院MBA校友）

周瑛锋（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主持人、北大国发院EMBA校友）

朱晓楠（GC首席人力官及投资MD、北大国发院CHO100成员）

《北大承泽参考》获取方式：

扫描“北大国发院学习小助手”二维码加入学习群，我们将在群内第一时间分享新刊电子版。



北大国发院
学习小助手

*【特别声明】本资料为北大国发院编选制作的内部学习资料，仅供参考，严禁外传。